

# 石室《心經》音寫抄本 校釋初稿之一

萬金川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提要

敦煌遺書裡有五件《心經》音寫抄本，其中斯二四六四號的抄本即是當年《大正藏·般若部》<sup>1</sup>據以錄文而題名為《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本子。關於此一音寫抄本的譯者歸屬問題，學者之間雖也有長田徹澄針對該一抄本題記裡所云「出自奘師之手」的說法提出質疑，<sup>2</sup>但多數學者似乎仍然接受斯二四六四號抄本題記中的記述，而認定該一文本乃出自玄奘所譯。在這個問題上，陳寅恪先生或許是華夏學圈裡首先發難質疑題記之說的學人，他曾懷疑該一石室文本或許並非出自玄奘而是來自不空所譯。<sup>3</sup>此後方廣錫教授也提出了類似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並主張該一文本或為「玄奘原譯」，而由「不空潤色」。但陳、方兩人也都不曾提出任何積極有效的證據以實其說。

4

及至 1985 年，福井文雅教授以〈新出「不空譯」梵本写本般若心經〉為題，藉由文獻學的比對與若干經錄的載記，學界之間似乎才有學者真正面對

<sup>1</sup> 《大正藏》No.256，T8，頁 851a~852a。

<sup>2</sup> 參見《密教文化》第五十六號（昭和十年），頁 44~5。

<sup>3</sup> 參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75。

<sup>4</sup> 方氏之說參見氏編《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前言」頁 12。

了問題而嘗試證成此一說法。<sup>5</sup>此後福井教授繼雲居寺《房山石經》的出土與刊佈，一連串發表了不少有關《心經》音寫本的論文。然而，在有關譯者的歸屬問題上，福井教授的立場則一如他所使用的論證方式，始終都未曾改變，仍然堅持敦煌石室抄本與《房山石經》裡兩方《心經》音寫刻石之一，是出自不空三藏之手。我們雖然並沒有在譯者歸屬的認定上提出任何新穎的說法，但是在這個問題的探究上，卻也不打算再度採取福井教授那種純以外部證據來進行論證的方式。在本文對《心經》音寫抄本的校釋過程裡，我們將嘗試讓這些文本自己訴說它們的身世。

換言之，我們準備從這些文本自身的「口供」與「筆錄」著手，而試圖透過其內部字裡行間所反映出來的語音特徵的描寫，以及其間音寫用字的選造分析，來找出更為直接而有力的證據，從而顯示我們在譯者歸屬問題上的論斷也更具可靠性。並且，我們認為這種藉由語段的音韻分析以及字詞選造的風格學分析(stylistic analysis)，其間所能得出來的證據將會比福井教授所舉出來的那些外部證據更為直接而有力。蓋諸如《房山石經》之類的出土文獻，這一類外部證據的獲致往往都是既偶然而又意外的，但文獻的語音特徵乃至其間字詞選造的語言風格之類的成素，則明顯的具有其存有論上的旨趣(ontological significance)，因為它們都是內在於文獻之中並跟隨文獻的存在而存在。

**關鍵詞：**心經、音寫、音譯、梵漢對音、佛經譯音、二合、引、中古音、隋唐音韻、長安方言、河西方言、風格學分析

#### 【校釋說明】

1. 斯二四六四號、斯五六四八號、伯二三二二號、斯五六二七號與斯三一七八號，以上五件石室遺書總稱「石室本」，並依次簡稱「甲本」乃至「戊本」；此中，甲乙丙三本，又稱「石室夾注本」。《房山石經》所收不空三藏與慈

---

<sup>5</sup> 福井之文參見《仏教學論集——中村瑞隆博士古稀記念論集》，頁 229~246。

賢法師所譯之音寫本總稱「石經本」，並依次簡稱「石經甲本」與「石經乙本」。又、東寺所藏漢音轉寫並梵字悉曇對照，題名為《唐梵對翻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傳世抄本，簡稱「東寺本」。

2. 《心經》梵語原典則取自長田徹澄論文所附「東寺本」梵字悉曇羅馬音寫本，同時並參照田久保周譽著《解說般若心經》與《梵字悉曇》兩書所附之相關文獻。此中，法隆寺多羅葉梵語寫本，簡稱 A 本；Müller 校本，簡稱 B 本；Conze 校本，簡稱 C 本；Hurvitz 漢音還原梵本，簡稱 D 本；福井文雅石經甲乙二本漢音還原梵本，依次簡稱 E 本與 F 本。
3. 抄本正文除前後「經題」以標楷 18 號表之，其餘部分則通採細明 14 號。小字夾注，一律出之以 12 號細明，並依其內容而分別以斜體表音讀提示，以網底字體表語段意譯，以字元框線表語段編碼。至於注釋中的字元網底字或粗體字等，則但為醒目而已。又、校訂本增入原石室抄本所無的文字，則一律置於角弧號”[ ]”中，而注釋裡依漢音還原的梵語，則於該一梵語左側以星號”\*”標之。
4. 正文中梵語羅馬音寫斜體加字元框底，其一是表示依梵語語法與音變規則，當該增入的梵音，其二則為 ABC 三本皆有的語段，而於石室抄本語段之中未加以充分反映的梵音。至於 ABC 三本皆有，而在石室抄本的語段裡全然不曾著錄者，如 A 本正文之前的禮敬文”*namas sarva-jbaya*”之類，則在校釋過程中將不加以處理。
5. 藏經資料除若干單行文本外，一律取自《大正新脩大藏經》，同時並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依該一藏經錄製而成的數位化佛典，後者簡稱 CBETA。漢語字詞的切語、聲紐、韻部與中古擬音等，主要取自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中華書局，1999，北京，初版，第一刷)，間或參考郭錫良編《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初版，第一刷)與《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第三刷)。再者，有關字詞訓釋與敦煌俗體字的研究，則分別取材自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初版，第一刷)、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初版，第一刷；1998，初版，第二刷)、《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初版，第一刷)，及其《漢語俗字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初版，第一刷)。此外，校釋中有關漢音的梵語還原，則參考平川彰主編《佛教漢梵大辭典》(東京靈友會，1997，初版，第一刷)。



# 石室《心經》音寫抄本

## 校釋初稿之一

萬金川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梵語<sup>(注一)</sup>般若波羅蜜多心經<sup>(注二)</sup>  
觀自在菩薩與<sup>(注三)</sup>三藏法師玄奘<sup>(注四)</sup>親教授梵本不空<sup>(注五)</sup>潤色<sup>(注六)</sup>

注一 甲本作「梵本」，而尾記則題作「梵語」；乙丙丁戊四本題記皆作「梵語」，而除乙本尾記作「梵本」外，其餘三本的尾記，今已難知其詳。又、東寺本前分序文的開卷之語作：「梵語《般若心經》者，大唐三藏之所譯也」，而其文異於石室甲本開卷之語者有二：一者「梵語」與「梵本」之別，二者《心經》與《多心經》之差。按：關於經題《心經》或《多心經》的問題，參見下文注二。至於題記所謂「梵語」或「梵本」的差別問題。吾人或可先從《心經》音寫抄本的書寫緣起來探討這項問題。《心經》石室抄本何以竟採取漢音直書梵語的方式輯成文本而流傳於瓜沙邊地？尋其初衷，當不在瀏覽之需而實乃備於口頭持誦之便，因此稱之為「語」，或許比名之為「本」來得更為恰當。特別是在以口語傳播為中心的古典印度的知識世界裡，其「文本(text)」概念，基本上便迥異於以文字傳播為中心的華夏地區。

《佛國記》曾經載述法顯當年西行，「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從法顯個人所面臨的這種「文本」概念上的窘境來看，或

---

\* 送審日期：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許多少可以理解到華梵之間在知識傳遞上的根本差異。

鄭樵《通志·六書略》「論華梵」條便有所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之說，而他同時更認為其間的最大出入乃在於「音、字」之別，亦即所謂「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的不同。鄭樵以上這些言簡意賅的分析，可以說是極其深刻地洞見了中、印這兩大文明在「語言文化」(culture of language)形態上所展現出來的重大差異。

至於房山石經浩大而驚人的工程，其本身更可以說是漢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的最佳見證。石經甲乙二本的題記與尾記則皆署名「梵本」，而這種石經本與石室本在題署之間的差異，不也足以顯示瓜沙邊地與華夏中原之間在「語言文化」走向上的落差。至於口語文學與書面文學在「文本觀」上的出入，則可謂是此中之大者。變文等口語式的講唱文學允稱敦煌遺書之奇葩，這種口語文學的類型或非中土所固有，而其能生發滋長於瓜沙之際，豈曰偶然而已。

**注二** 石室諸本除戊本題作「般若多心經」之外，其餘諸本皆署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而石經二本的首尾題記則皆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又、甲本尾記的經名雖署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但其前分序文的開卷之語卻將經題署為「梵本《多心經》」。至於乙本的尾記，則題為「般若心經」，其餘諸本，則或因於散佚，或未曾著錄，而難以知其尾題之詳矣。

至於戊本題記作「般若多心經」而非「般若心經」，乃至所謂「多心經」的問題，長年以來多數學者在面對石室所出而書作《多心經》的龐大抄本群之際，若非視此中之「多」為衍字，便是把「多心經」一詞視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一個拙劣的縮略形式。<sup>6</sup>福井文雅教授針對這個令人困惑的「多心」問題，曾經以〈般若心經觀在中國的變遷〉為題撰文析論，辨之甚詳，此處不贅，意者或可直接參看福井文雅 1983(頁 17~30)或福井文雅 1987(頁 11~23)。

**注三** 甲本作「与」，乙丙丁戊四本作「與」。又、《大正藏》錄文亦作「與」。按：就文本的斟酌而言，「錄文」與「錄校」，其性質並不相同。睽之當年《大正藏》收錄石室《心經》音寫抄本的原委，則其之所為，實乃據斯二四六四號的甲本以進行錄文而已，若逕自將甲本的「与」轉錄為「與」，此舉或有擅改抄本之嫌，實違於錄文者首當奉原件抄本的樣式為尊，而不輕言改易其貌

<sup>6</sup> 參見周一良著·錢文忠譯(1996)，頁 302。

的學術格範。

**注四** 甲丙丁三本皆作「法師玄奘」；乙本作「法師玄奘」；戊本作「法師 玄裝」。按：戊本「裝」當為「奘」之誤也。又、戊本於「玄裝」前則留空以示敬意，一般稱此為「敬空符」。然而，丁本在語段之間，除了使用間隔符”·”之外，也往往因於語段誦讀上的分際而有特為留空之處，但丁本這種文間留白的意思顯然與示敬用法並不相同。

**注五** 乙本作「不空」；甲丙丁戊四本則但作「不」。按：石室抄本題記之間，或書「不潤色」，或書「不空潤色」，這究竟是抄手的無心之失？還是另有其他隱情？在這一方面，我們目前雖然缺乏漢地書面史料上的外部證據來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心經》石室抄本在梵音轉寫的語音特徵上，卻大體反映了不空三藏譯寫梵音的風格。在後文校釋的過程裡，此類特屬不空譯經集團音譯系統之中的音韻特徵，或將一一浮現。

**注六** 甲丁二本作「潤」，乙丙戊三本則作「閏」。按：閏，《說文·王部》：「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至於潤，《慧琳音義·卷二》在分釋「滋潤」音義之際，則更引《廣雅》與《玉篇》等字書以明其本義：「如順反，《廣雅》：『潤，濕也』，《玉篇》：『飾也』，《說文》：『水曰潤下，從水，閏聲也。』」。由此可見，「閏」之與「潤」實乃音同而義別。又、《字詁·閏》則云：「潤，後因閏月義專，濫閏字遂借潤下之潤，而本義亡矣」。再者，《素問·痿論》有所謂：「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閏宗筋」，吳崑於此則注之曰：「閏，潤同」。因此，「閏」之與「潤」，或同音假借而相沿成俗。乙丙戊三本此處作「閏」，或非抄手省形之誤，實乃正俗之別而已。

又、石室諸抄本與石經甲乙二本的題記安排，今且分述如下：

1. 甲本於中分密咒「蓮花部普讚歎三寶」之前，有題記作「特進鴻臚卿開府議同三司封肅國公贈司空官食邑三千戶 勅諡大辯正廣不空奉詔譯」，而於後分正文之前有題記作「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授梵本不潤色」；
2. 乙本則在中分密咒「蓮花部普讚歎三寶」之後，置有題記而作「勅諡大辯正廣智不空奉詔譯 梵語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授梵本 不空閏色」；
3. 丙丁二本皆未著錄中分密咒，其後分正文之前的題記也都無官銜或諡號而直書作「梵語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授

梵本不閏色」；

4. 戊本於中分密咒前無任何題記，而於「蓮花部普讚歎三寶」的密咒之後，則題作「梵語般若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 玄奘親教授梵本不閏色」；
5. 石經甲本題署作「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開元三朝灌頂國師和尚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 不空奉 詔譯」；
6. 石經乙本作「大契丹國師中天竺摩竭陁國三藏法師 慈賢 譯」。

從以上各本的題記安排，便可以清楚見出石室本與石經本彼此在題記上最為差異之處，乃在後者都未著錄「觀自在...潤色」之類的文字，而保存在日本的傳世抄本亦復如是。由此可見，「觀自在...潤色」之類的題記，實乃石室音寫抄本不共石經等其他諸本的特色。

又、關於不空三藏的榮銜與謚號，依《佛祖統紀·卷二十九》：「肅、代兩朝，尊為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贈鴻臚卿。晚年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六月，示寂於大興善寺。上廢朝三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T49，頁295c)。

其次，《貞元釋教錄》作「大唐特進試鴻臚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贈司空謚大辯正大廣智不空三藏和上」，而《大乘密嚴經》等譯經題記則作「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謚大鑑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日僧空海所纂編的《御請來目錄》則同於《貞元錄》。此外，關於這些榮銜與謚號的受封由來及其次第，不空弟子趙遷所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T50，頁292b~294c)，以及門下慧朗所撰《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T50，頁712a~714a)皆述之甚詳，而與《貞元錄》等之載記相符，文煩不引。<sup>7</sup>因此，石室甲本的「特進鴻臚卿」，當作「特進試鴻臚卿」，「議」當改作「儀」，「辦」當改作「辯」或「辨」，而甲本「大辦正廣」或應依石經甲本與傳記經錄等傳世文獻而改作「大辯正廣智」或「大辯正大廣智」。

又、石室本與石經本均作「謚」，傳世文獻或書為「諡」。按：「諡」之與「謚」，實乃正俗之別。「謚」，《說文·言部》：「謚，行之迹也。從言、兮、

<sup>7</sup> 不空傳記的研究，或可參見周一良·錢文忠譯(1996)，頁55~79。

皿，闕」。徐鍇繫傳作「從言、兮，皿聲」。嚴可均《說文校議》：「諡，《說解》當作『益聲』」。邵瑛《群經正字》：「今經典以諡爲諡」。「諡」，《說文·言部》：「諡，笑貌。從言，益聲」。嚴可均《說文校議》則以爲「諡」原無「笑貌」之訓，人既改「諡」爲「諡」，復取《字林》以「諡」爲笑聲而竄入，實則「諡」之訓或當作「行之迹也。從言，益聲」。《爾雅·釋詁上》：「諡，靜也」，郝懿行《爾雅義疏》：「諡，今本《說文》作『諡』。諡乃諡之俗體」。而《玄應音義·卷十三》釋「諡比」則云：「神至反(《慧琳音義·卷五十七》引玄應文而改作「時至反」)。《說文》：『行之迹也，從言，益聲。』」<sup>8</sup>此處玄應所言，或可用佐前揭嚴、郝之說也。

## 1. Prajba-paramita-hrdaya-Sutram

鉢囉二合般誡攘(注一)二合[引]若播[引]波囉羅弭蜜哆[引] (注二)多紇哩  
(注三)二合那野(注四)心素[引]但覽[二合](注五)經[ ](注六)

注一 丁本作「鉢囉穰·」，戊本作「鉢囉攘」，石室夾注本皆作「鉢囉二合誡攘二合」，東寺本作「鉢羅二合枳-壤、二合」，石經甲本作「鉢囉二合枳壤二合」，石經乙本作「鉢囉二合倪也二合」。

按：關於梵語輔音串音節 **pra** 的對譯，諸本之間除東寺本作「鉢羅」外，其餘諸本都無差異而作「鉢囉」。此中，用以對譯梵語清塞音 **p** 的二合前聲「鉢」，《廣韻》作「北末切」，幫母末韻，梵音漢聲對譯妥貼。至於其後聲的「囉、羅」用以對譯梵語顛音音節 **ra** 的問題，且詳後文。又、此處之「鉢」字，原指僧眾飲食之器，所謂 **patra** 是也。不論其書爲「鉢」或寫作「鉢」，該一漢詞原初乃中土譯師爲直書 **patra** 之音而撰造出來的新字，所謂「鉢多羅」是也。其後該一梵名雖然也有以音義合璧方式而譯出的「鉢盂」一詞，但縮略其原初音節而簡稱爲「鉢」者，則堪稱大宗而蔚成主流。唐宋以降該一外來詞則儼然成爲漢地全民通語裡的詞匯，而完全融入了漢語的詞匯世界。

至於採來母一等字的「囉、羅」對譯梵語顛音音節 **ra**，則自佛典逡譯之初，既已有之，而「阿羅漢」之對譯 **arahat**，或許便是其中最爲著名的譯例吧！雖然如此，入唐之後，隨著新譯時代的來臨，在梵漢之間審音日趨嚴密的要求下，爲了簡別梵語邊音 **la** 與顛音 **ra** 的對譯，乃有所謂「羅利盧栗黎

<sup>8</sup> 周法高編製索引·弘教本(1962)，頁 55b；《大正藏》，T54，頁 688c。

藍等字，傍加口者，轉聲讀」，<sup>9</sup>或是所謂「咒文中字，口傍作者，皆轉舌讀之」<sup>10</sup>這一類譯師們的精心設計便跟著應運而生。因此，從這一點來看，東寺本的「羅」若非抄手之誤，以不空譯場的音寫格範而言，便屬出格之舉。

至於「穰」之與「攘」，二者雖皆屬日母，但前者用例則僅見於丁本一例而已。《慧琳音義·卷十》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下卷》云：「枳穰二合，上鷄以反，穰取上聲。經從禾，誤也。」由此可知，丁本作「穰」，若非抄手形近之訛，便是隨順俗體而來。又、丁戊二本略去了「誡攘二合」的前聲，亦即梵語舌面塞擦音 **j** 的對譯「誡」。此中，丁戊二本的省音現象，其間在某些情況下或許也可稱之為是語流音變裡的「減音」現象。關於石室抄本的這些省音問題，此處不擬論列。且待全文校釋工作告一段落，再做若干通盤的考察。

又、石室夾注本皆以「誡攘二合」對譯梵語輔音串音節 **jba**，而東寺本則以「枳穰二合」對譯。至於石經二本，則分別以「枳穰二合」與「倪也二合」轉寫之。按：以「誡攘」音寫梵語輔音串音節 **jba**，但見於石室《心經》的五件抄本之中，除此而外，CBETA 的錄文則更無其他相同譯例。至於東寺本的「枳穰二合」之譯，CBETA 錄文中則無與此相合之例，但以「枳穰二合」而出者，凡有四例：<sup>11</sup>

- 一、曩莫三滿多沒馱引喃 **一枳穰二合怒二** (\*namo sarvatha buddhanam **jbanam**; T18, 頁 111b)；
- 二、曩莫三滿多沒馱喃 **枳穰二合怒智也**，即諸佛之智。(T18, 147b)；
- 三、薩縛勃馱一切佛 **枳穰二合曩知也** (\*sarva-buddha-**jvana**; T20, 頁 123b)；
- 四、尾 **枳穰二合引曩** (識, \*vij**vana**; T54, 頁 1209b)。

雖然如此，但以上四例皆出於扶桑所傳之中土密咒譯籍。此中「穰、攘、穰」之間是否有其傳抄之訛，實難以確知。但其間可能的傳抄轉錄之誤，或可見之於前揭例三《大正藏》錄文的右前七行(亦即 T20, 頁 123b.1)，其第二十句真言中之「薩悉地成就一切摩訶 **枳穰二合曩大智惠**」(\*sarvasiddhi-maha**jvana**)，則又作「枳穰」。

<sup>9</sup> 參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T19，頁 354a 雙排小字夾注。

<sup>10</sup> 參見《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T19，頁 509b 雙排小字夾注。

<sup>11</sup> 疑東寺本「穰」或為「攘」之誤。

至於石經甲本以「枳孃」對譯梵語輔音串音節 **jba** 的問題。其中當該留意的，乃是此一音寫形式的首出之例。檢索 CBETA 錄文，則可以發現該一音寫形式，實乃不空三藏於所譯《大雲輪請雨經》的密咒中率先啓其端緒：**鉢囉二合引枳孃二合引**(T19, 頁 487b)。又、前揭譯例裡對 **pra** 而夾注為「引」，則極可能是混淆了「長音節」與梵詩格律「重音節」的分野。依唐宋夾注之通例，所謂「注引字者，皆須引聲讀之」，這乃是指「長音節」而言。由於在音節 **pra** 之後緊接輔音串 **jb**，因此若依梵詩格律，則 **pra** 就必須以「重音節」視之，但是從前開音寫語段出現的語脈來看，則該一場合實非偈頌體式。<sup>12</sup> 由此或可見出，《慧琳音義》或許只是襲用了不空所出之音寫並給出「雞以反」的音讀而已。

其次，尤堪注意的，則是《慧琳音義》在進行奘師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理趣分》的音義注釋之際，對於其間的真言密咒則明顯地有以「新音」代換奘師「舊聲」的傾向。此處或可暫以兩個有關 **prajba-paramita** 的音寫為例，便可見出此一傾向。慧琳所以如此大費周章著手「改訂」奘師音寫，極有可能是因於其時的長安方音的確是出現了若干的變化吧！

這兩個有關 **prajba-paramita** 的音寫之例皆出於《慧琳音義·卷八》「釋《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八卷·理趣分》」，而它們原初其實就是般若經文獻群裡相當頻出的經前禮敬文—「禮敬世尊母般若波羅蜜多」(\*namo bhagavatyai prajbaparamitayai)：

- 一、三界自在，常能堅固饒益有情。爾時如來即說神呪：「**曩謨婆去誡魚伽反**，又取上聲**囉無可反**，後文同帶引**鉢囉二合**，轉舌**枳孃二合引**，上經以反；孃取上聲**播引囉羅字上聲**，兼轉舌**弭多上聲**，引**曳**以豎反，引，後亦同此**三...**」(T54, 頁 353c)；
- 二、爾時如來復說神呪：「**曩謨引婆去**，引**誡囉無鉢反**帶引**鉢囉二合枳孃二合播引囉轉舌弭多上聲**，引**曳引三...**」(T54, 頁 354c)。

前開兩段出自《慧琳音義》「引錄」奘師所譯《大般若經》的經文，在玄

<sup>12</sup> 當然，如果這些經文被要求按一定的曲調來誦，則此中用「引」所提示的音讀重點，或許便不在於其音節的長短，而是按韻文一般的要求，而用來指示該一音節在吟誦之際的輕重。譬如在語段**五**中，石經甲本以「半左引」來對譯 **pabca**，而其第二音節的漢音「左」下夾注了「引」字，顯然便是著眼於 **ca** 的後一音節是以輔音串 **sk** 開頭的 **skandhas**。

奘原初所譯的《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八卷·理趣分》裡則分別作：

- 一、 三界自在，常能堅固饒益有情。爾時如來即說神咒：「納慕薄伽筏帝<sup>□</sup>鉢刺(按：「刺」當為「刺」之訛)壤波囉弭多曳...」(T07, 頁 990c)；
- 二、 爾時如來復說神咒：「納慕薄伽筏帝<sup>□</sup>鉢刺(當作「刺」)壤波囉弭多曳...」(T07, 頁 991a)。

從以上慧琳堅持以「鉢囉枳孃」取代奘師「鉢刺壤」之譯來看，「鉢囉枳孃」這個轉寫語形或可視為是不空翻譯集團的標誌之一吧！

此外，慧琳的審音「改訂」，似乎也及於玄應所撰的《一切經音義》。譬如在《慧琳音義·卷二十四》題為「《佛說兜沙經》一卷·玄應撰」的部分裡有所謂：「[†+若]那(\*jbana)而者反，梵語訛也，正梵音云枳孃曩也」。然而，今核查「高麗藏」所收之《玄應音義》以及周法高編製索引·弘教本，則在玄應所撰之《兜沙經音義》中皆無此段音義釋文。因而前開《慧琳音義》署為「玄應撰」者，其間文字或乃出於慧琳的「改訂」。又、「[†+若]」，《玉篇·心部》：「惹，亂也。[†+若]，同上」。《集韻·鐸韻》於該詞則給出了兩讀：一作「匿各切」，泥母鐸韻；一作「日灼切」，日母藥韻。從前揭引文「而者反」的切語上字來看(「而」，《廣韻》作「如之切」)，則此處的「[†+若]」當讀作「日灼切」，而為日母字。

從慧琳批評前此以「[†+若]那」對譯梵語 **jbana** 為訛，並認為枳孃曩之譯方得梵音之正，則多少可以見出慧琳本人似乎並不認為在西元八世紀的長安方言裡，日母的音讀可以用來對譯梵語舌面輔音串 **jb**，並且如同下文所示的，慧琳主張代之以「枳孃二合」來對譯它。根據蒲立本 1962(頁 7)，唐前和初唐日母只用來對譯一個簡單的鼻顎音 **ba**。及至七世紀末的唐代長安方言，鼻聲母則都出現了一個同部位的關閉動作，使鼻音部分地非鼻音化： $\eta >^n g$ 、 $n >^n d$ 、 $n >^n d$ 、 $m >^n b$ 、 $n >^n dz$ 。因而，我們便可以見到不空與慧琳一系用鼻音對譯梵語濁塞音的情況，<sup>13</sup>並且這種變化在帶鼻韻尾的字中出現得最晚，像「孃」或「穰」(M.n ĩ a η)，慧琳仍然用來對譯 **ba**，而「若」(M.n ĩ a)，則只能用來對譯 **ja** 了。

其次，關於「枳孃」一詞中「枳」的音讀問題。柯蔚南 1994(頁 41) 指

<sup>13</sup> 如同本語段注四裡以泥母的「那」對譯梵語的 da。

出在《慧琳音義》裡，章母一系的「之耳反」與「之里反」，這類音讀但只出現於諸如「枳園」或「枳園寺」的專名上；而讀爲見母一系的「鷄以反」與「經以反」等，則在慧琳著作中擔負兩項不同任務，一者用於冷僻的文言書面語植物名稱「枳椇上吉以反，下俱字反*j i j w*，山木名也」(T54，頁 870)。<sup>14</sup>除此而外，所有其他的用例都只出現在梵文語詞的漢音轉寫裡，並且其間多數的情況是用以對譯梵語清塞音音節 **ki** 或 **ki**。因此，柯蔚南便認爲慧琳轉寫梵語 **-jbyah** 之際，使用複音詞「枳孃」(**kjie**:<sup>4</sup> **njang**)來對譯它，則可謂是慧琳音譯系統裡的一項例外。

按：柯蔚南前開梵語 **-jbyah** 的語形，實不明其典據爲何？雖然從語形上來看，**-jbyah** 的確是個單音節語段，而慧琳竟然會使用漢語複音詞的形式來對譯它，確實有點蹊蹺。然而，事實上，諸如 **-jbyah** 的語形似乎從來就不曾在梵語佛典的文獻裡出現過。此外，不知柯氏可曾注意到《慧琳音義》裡但凡在述及「枳孃」音讀之際，往往其下皆有「二合」的小字夾注，此其一也。再者，除了直譯其音的真言密咒，如《慧琳音義·卷八》：「枳孃二合引，上經以反，孃取上聲」(T5，頁 354a)之外，同書卷十三：「般羅若(\***prajba**)梵語訛略也，正梵音鉢囉二合，枳孃二合，唐云惠，或云智慧」，則「枳孃」明確地乃是梵語 **jba** 的對譯。因此，柯氏此處作 **-jbyah**，或恐有誤。雖然如此，但以「枳孃」對譯 **jba**，似乎仍然可以看成是不空乃至慧琳一系音寫選詞的特徵之一。石經甲本也因為具備了這項特有的音寫詞而在譯者歸屬問題上，可以得到相當正面的回應，但石室諸本在這個音寫漢字的反映上，其回應顯然是負面的。

其次，關於石經乙本「倪也」的音寫。在這個問題上，儲泰松 1998(頁 48)於論述「泥娘疑早期混用的面貌及日紐的音值」之際，曾提及了一項與「倪也」一詞音寫年代可能有關連的線索，或許值得我們稍加留意。儲教授在考察梵語鼻聲輔音的漢地音寫流變的過程中，把其間有關梵語舌面鼻音 **b** 的漢音轉寫歷程分爲三個時期，並認爲入宋之後，施護與惟淨以 **b** 對疑紐，則與前此的時期大不相同。其中施護以「研、倪」兩個四等字對譯 **b**。惟淨對譯 **b**，則用一二等字的「識、岩、諤」與三四等字的「疑、詣、虞」；但惟淨對譯 **b**，則用「倪倪也切、語、堯」。這些具有 *i* 介音的三四等字容易使得其前 **ŋ** 的發音部位前移而變成 **n**，這與今日不少方言裡古疑母字逢齊齒呼讀 **n** 一致，由此可見這種現象可以上溯到宋初。

<sup>14</sup> 《廣弘明集》卷二十九收有梁宣帝所撰〈遊七山寺賦〉，其文中便有「枳椇列植而爲藪，懸鉤觸草而徘徊」的文句。

事實上，檢索 CBETA 錄文中百條以上有關「倪也」的語段，而其結果則發現除了一二不相干的例字是出於趙宋之前外，其餘幾乎全出自北宋一代譯家遼譯的密咒中，並且以「倪也二合」的形式最為常見，「倪也二合引」則緊隨其後，而所謂「倪也切身」也能偶一見之。因此，不論從檢索 CBETA 的外證來看，或是從梵語鼻聲輔音於漢地轉寫之中所表現出來的音韻流變歷程來看，石經乙本是入宋之後的作品，基本上是極其可信的。以下請嘗試分論輔音串 **jba** 的諸本對譯。

此中，二合後聲一亦即用以音寫梵語舌面鼻音 **b** 的漢字—「攘、穰、孃」三者，其音讀皆為日母。至於石經乙本的二合後聲，依通例當為以母字的「也」，但它似乎並不是用來對譯梵語舌面鼻音 **b**，而只有在諸如柯蔚南所出之 **jbya** 的語形下，「也」或可勉強稱之為二合後聲，但這個語形在梵語文獻裡似乎不會出現。因此，除非「倪也」是指示梵語輔音串音節 **jba** 的實際音讀當為 **/jbya/**，而以母字的「也」則有可能為該一音讀中 **ya** 的對譯。因而石經乙本此處的「倪也二合」之例，除非其間出現語流音變的「減音」現象，否則根本講不通。事實上，若依前開 **/jbya/** 所示之音讀，則「倪也」下的夾注或當改作「切身」，而非「二合」，亦即以「倪」表切上字，而以「也」表其下字；但此處不論是將梵語 **jba** 讀作倪也切或倪也切身，則明顯的乃是一種依漢地音節結構而來的重組，而實際上在梵語音節的區劃裡，並不允許諸如漢地韻部裡的「介音」或「韻頭」之類東西存在其間，因為這些半元音往往被劃入下一音節而成為輔音頭了。若是將此處的「二合」改作「切身」來理解，則石經乙本便是用疑母四等字的「倪」來對譯梵語舌面塞擦輔音串 **jb**，而在實際音讀裡因於語流音變而出現了如同石室丁戊二本舌面塞擦音 **j** 的「減音」現象。

至於其他諸本以日母的「攘、穰、孃」等字來對譯梵語舌面鼻音 **b**，則為有唐一代音譯梵字的通例，而劉廣和 1994(頁 43)更指出：不空三藏除了以日母出字外更兼採娘母來對譯梵語舌面鼻音 **b**，這當然便構成其音譯系統的特徵之一。羅常培 1931(頁 58~60)曾經從歷時性的觀點提及了梵文顎音五母的漢字譯音的確有其參差不一之處，他並且認為此中的出入，除了宗派師承的因素外，其他兩項和語言有關的原因則可能是梵漢兩地的方音差別以及中土音韻本身的流變，而使得西元八世紀之後不空一派不採正齒音(照、穿、禪)或半齒音(日母)，而以齒頭音(精、清、從)或舌上音(娘母)來對譯梵文顎音。當代學者之間諸如劉廣和 1984、1994 與柯蔚南 1991、1994、1999 則藉由佛經

音寫詞或是其他在地的音注文獻，而致力於西北方言的歷史方言學研究，而逐漸落實了羅氏早年的後兩項推測。

至於二合前聲，以下請再嘗試論之。此中，諸本之間用以音寫梵語舌面塞擦音 **j** 的漢字，若依唐·杜行顛所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中的「雙排小字夾注」，所謂「注二合者，半上字連聲讀」的體例(參見 T19, 頁 354a)，或是《慧琳音義·卷一》中的「雙排小字夾注」，所謂「二合者，兩字各取半音，合爲一聲」(參見 T54, 頁 313c)，則當爲「譏、枳、倪」三者。然而，此中石經乙本的「倪」，或應視作梵語舌面輔音串 **jb** 的對譯，而非舌面塞擦音 **j** 的對譯。至於石室夾注本的「譏」，《廣韻》作「五何切」，疑母歌韻；《集韻·哿韻》作「語可切」，其音讀亦是疑母。然而，根據施向東 1983(頁 28, 表 1-2)與劉廣和 1994(頁 42~43)，採疑母字來對譯梵語舌面塞擦音 **j**，似乎在有唐一代的譯場中都無此類譯例。

其次，在石經本與東寺本「枳」的音讀上，該字《廣韻》作二讀：一爲「諸氏切」，章母紙韻，中古擬音或爲 **/tʃ ĭ e/**；一爲「居希切」，見母支韻，中古擬音或爲 **/k ĭ e/**。《慧琳音義》對「枳」所標示的音讀，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它既有見母一系列的「鷄以反」、「經以反」與「吉以反」，同時也有章母一系列的「之耳反」與「之里反」；此外，它還更有曉母一系列的「馨雞反」。雖然如此，根據前引《慧琳音義·卷十》所出「鷄以反」的切語，則此處「枳」的音讀，當爲見母。如此，在梵語舌面塞擦音 **j** 的對譯上，與《慧琳音義》所出音讀相順的石經甲本，則和其他諸本之間呈現出了疑母與見母的音寫落差。至於疑母的音值，以下且試論之。

劉廣和 1984(頁 9)認爲在唐代八世紀的長安方言裡，疑母的音值是 **/ŋ g/**，而高田時雄 1988(頁 109)也指出西元十世紀的河西方言裡也依然維持著這個音值。就「譏」的音讀而論，《慧琳音義》其實有多處都提及了該字的切語：**那譏**(\*naga)魚何反/**\*ŋ a /**(T54, 頁 571a)、**譏字**(\*ga-kara)魚佉反/**\*ŋ a /**，**上聲呼及**·**經中書加字甚重**(T54, 頁 335a)、**曩譏**(\*naga)上曩朗反，下虐迦反/**\*ŋ a /**。龍之總名(T54, 頁 590a)。從切語上字來看，《慧琳音義》反映出了「譏」的音讀爲疑母，但他本人卻使用見母的「枳」而並未用該字來對譯梵語舌面塞擦音 **j**，並且還認爲疑母的「譏」應該是用以對譯梵語濁塞音 **g**。在這一點上慧琳是和空三藏完全一致的，但卻相左於玄奘與義淨等人以群母出字對譯梵

語濁塞音 **g** 的音寫系統。<sup>15</sup>

此外，在《慧琳音義》裡，以下兩則與疑母音值相關的梵語音讀，似乎更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 一、**殞伽(gavga)**梵語也。上凝等反，下魚佉反，西國河神名也。涅槃經云恒河女神是也(T54，頁325c)；
- 二、**彌伽(gavga)**梵語，西國河名也。此借唐言以響梵字，猶未全切。若准梵音，上彌應音為凝等反，亦凝之上聲也，下魚迦反為正也。古經或云恒伽河，或云恒邊沙，或云兢伽，皆一也。不切當也(T54，頁368c)。

此中，前者是慧琳對奘師所譯《大般若經》中所出「殞伽」之譯的音注，而後者則為慧琳對義淨所譯《金剛經》中以「彌伽」音寫梵語 **gavga** 的批評。由此可見，在慧琳心目中，關於梵語 **gavga** 的開頭濁塞輔音 **g** 以及輔音串音節 **vga** 的音寫，他對玄奘與義淨這兩位譯經前輩是有若干微辭的，而這一點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正反映了西元八世紀長安方音的一些變遷。在奘師與義淨的梵音轉寫系統裡，他們都同時使用了群母字來對譯開頭濁塞輔音 **g** 與輔音串音節 **vga**；然而，在慧琳的音寫系統裡，則用疑母出字來對譯濁塞輔音 **g** 與輔音串音節 **vga**。因此，慧琳時期長安音裡的疑母音值為 /<sup>h</sup>g/，而這正如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中以泥母的「那」對譯 *hrdaya* 的 *da* 情形一樣，往往在濁塞音之前帶有同部位的鼻音，這一點應該是相當清楚的。至於說在對譯梵語舌面塞擦音 **j** 上，不空與慧琳一系的「枳」和石室夾注三本的「譏」，其音讀之間的落差是方音現象，或是其他原因，則有待於高明。

【筆者追記】拙文在送交審查的過程裡，其中一位匿名的審查者指出《心經》音寫本：用「鉢囉二合」表複聲母音節 *pra*，又以「枳孃二合」表 *jba*，如以相同原則，「譏攘二合」頗有問題...「譏」屬疑母，依例當用塞擦音(章系字)音譯。「譏」為一等洪音字，如受其後細音「攘」之影響，發音部位前移為 *n*，也不過音譯 *jba* 中之後一成分，並未譯 *j*，其故安在？應可進一步研究。此外，在「枳」的音讀上，審查者也同時指出《廣韻》所給出的章母音讀「諸氏切」，以及《慧琳音義》所給出的見母音讀「鷄以反」：此當為上古 *sk*→*k* 之殘留，主流演化為 *sk*→*ʈ*，而《慧琳音義·卷十》採「鷄以反」，應屬上述

<sup>15</sup> 參見劉廣和(1994)，頁42。

殘留之方言現象。因為 **tc** 才能對應梵文 **j**，**k** 不行。

【按】 審查者以上的這兩項觀察與意見都是極其正確而寶貴的，然而這些也正是筆者目前仍感困惑之處。此中前者，依劉廣和 1994(頁 43)所示，在梵語舌面塞擦音 **j** 的對譯上，義淨採禪母字而不空則通用禪、日、從三母，兩位譯師也都不曾使用疑母字來對譯梵語舌面塞擦音 **j**，而即使石室抄本中的「識」字在語流音變中讀如日母，則誠如審查者已經所指出的，「識攘二合」在音理上似乎仍然只能標出 **ba** 的音讀而已。若從源頭語的歷史音韻流變來看，梵語顎音”**ca**、**cha**、**ja**、**jha**、**ba**”的來源，分別是來自喉音”**ka**、**kha**、**ga**、**gha**、**va**”的顎化，<sup>16</sup>因此石室抄本以「識」來標注 **j** 的音讀，是否可能反映了某種梵語古讀的音值？當然，到目前為止，這些還都只是停留在猜測的階段而已。其次，在「枳」的音讀上，審查者的提示是值得重視的，雖然在不空等人的傳世譯例裡，他們仍然是以音讀尚未顎化的「枳」(鷄以反)來對譯梵語清塞音音節 **ki**，<sup>17</sup>而以音讀已然顎化的「之耳反」或「之里反」來標注在地植物「枳橘」的「枳」。<sup>18</sup>

注二 石室夾注三本作「播囉弭哆」，丁本作「婆囉迷馱·」，戊本作「播囉弭多」，東寺本作「波羅二合弭跢、」。石經甲本作「播囉弭跢上」，石經乙本作「播囉蜜多□」。

按：東寺本以「波羅二合」對譯 **para**，其「波羅」之譯或為慧琳之前的順古之譯，<sup>19</sup>而其「二合」的夾注則是不正確的。石室本與石經本也都無「波羅」之類的譯例，而石室夾注本則更分別於「播、囉」二字下夾以「波、羅」之注，此舉明顯地意在料簡古今譯音選字上的差別。

至於在整個 **paramita** 語段的音寫上，丁本則與其他諸本之間有著極大的出入：一者是「播、婆」之異，再者為「哆、馱」之別。若從漢語音韻歷時流變的角度來看，我們以為其間的落差，則頗具深意。以下且嘗試論之。

此中，「播、婆」之異，若從中古時期《切韻》乃至《廣韻》一系所出音讀來看，乃在於兩者之間一清一濁。此中，前者屬幫母，而其中古擬音為 /p u a /，依石室五件抄本所示，在多數情況下，該詞乃用以轉寫梵語清塞音音

<sup>16</sup> 參見 Whitney's 《Sanskrit Grammar》，§ 42~44。

<sup>17</sup> 參見語段□注七。

<sup>18</sup> 參見蒲立本(1962)，頁 61；柯蔚南(1994)，頁 41、208。

<sup>19</sup> 此中慧琳以「播囉弭多」改換樊師「波囉弭多」之譯，注一中已然具陳，而琳法師對古來「波羅蜜多」之譯的批評，下文將會述及。

節 **pa** 或 **pa**；而後者則為並母字，其中古擬音為 /b u a /，抄本中則皆以該詞對譯梵語濁塞音音節 **bha** 或 **bha**。其次，丁本「馱」，《廣韻》作「徒河切」，又作「唐佐切」，而這兩讀皆屬定母，並且在多數情況下，石室抄本則以該詞對譯梵語濁塞音音節 **dha** 或 **dha**，譬如語段[五]中以「塞建馱」對譯梵語 **skandha** 即是。

再者，關於「多」與「哆」。此中，前者《廣韻》作「得何切」，乃端母歌韻，而以之對譯梵語清塞音開音節 **ta** 或 **ta**，古舊兩譯乃至新譯時期皆有大量前例。至於「哆」，《廣韻》或作昌母紙韻的「尺氏切」，或作昌母馬韻的「昌者切」，但此類昌母的音讀實難以對譯前開之梵語音節。然則，除此而外，《廣韻》另有「又切」而反映了「哆」的不同音讀—「丁佐切」，此一切語則同於石經甲本「跢」的音讀，並且也和《慧琳音義》所出「當我反」的音讀相一致。如此，則「哆、跢」兩語的音讀皆屬端母箇韻，而與此處梵音 **ta** 正相符順。

然而，「多、哆、跢」三語雖同屬端母而皆可用以對譯梵語清塞音音節 **ta** 或 **ta**，石室本用「哆」而東寺本與石經本則採「跢」。然而，就石室夾注三本而言，則皆於「哆」下另夾有小字「多」之注，夾注者或許認為前者收去聲，而較之後者為平聲來得更貼近於梵語長元音音節 **ta**（參見劉廣和 1994，頁 55）。加之，戊本自身也於數處對譯梵語長元音音節 **ta** 的場合裡轉錄其音為「哆」，因而吾人或可據此而推斷戊本此處作「多」，實屬抄手形近而訛的誤筆。

至於「迷、弭、蜜」三語，其中古擬音分別為：/m i e i /、/m ĩ e /、/m ĩ ě t /。然而，它們在《中原音韻》一系列的近代音裡，聲部雖無變化而都為明母，但前兩者則在韻部的主元音上出現了相當明顯的變化而都轉讀為 /m i /；至於「蜜」，在近代音系裡也同時失去了其中古時期原先所具有的入聲韻尾 -t 而讀作 /m u i /。因此這三者雖同屬明母，但若就中古時期這三者之音讀上韻部主元音與韻尾的差異而論，則古譯時期已然出現的「波羅蜜」或「波羅蜜多」，及至新譯時期來臨，它們便受到了音讀不正確的指摘。

首先，由原語兩個音節的 **mita**（蜜多）而縮略為單音節收入聲韻尾的漢音 **m ĩ ě t**（蜜），這種透過漢地音節重組而略去原語尾部元音的音寫處理方式，在新譯時期裡則經常被玄奘或慧琳等人評之為「略」；至於採入聲韻尾的「蜜」而增入「多」，由是而成為諸如 **m ĩ ě t-t a** 一類的音讀，亦即試圖藉由前一音節入聲韻尾的 -t 在語流上合入繼起音節的開頭輔音 **t**，從而模擬

出梵語音節 **mita** 的讀音，這種以在地語言音節的音韻結構而重組梵語音節的手段，或許是舊譯時期譯家最喜於援用的音寫技巧之一，但是它們仍然受到新譯時期譯家們的物議，事實上這種被認為是乖離梵語音韻的音寫手法，非萬不得已，新譯時期的譯家們絕不出此「下策」來音寫梵語，尤其是在遙譯佛典中的密咒之際。

然而，石經乙本作「蜜多」，果真就是順古譯而非隨「今音」的新翻？石經乙本的譯者慈賢譯師，其生平事蹟未詳，《至元錄》稱他為「宋中天竺三藏」，《大正藏》所收慈賢譯籍的譯經題記稱他為「宋大契丹國師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而石經乙本的譯經題記則稱他為「大契丹國師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因此慈賢譯師抵華的時間大約在西元十世紀左右，而此一時期漢語音韻的流變已然邁入了中古音後期所謂「入聲韻消變」的階段，<sup>20</sup>試看上揭「蜜」的近代音《中原音韻》的擬音，已然是見不到入聲韻尾 **-t** 了。雖然《中原音韻》所示之音讀乃屬西元十三、四世紀的北方音系，但諸如此類的音韻變化，學者之間大體都認為至遲在前此的北宋時期的北方話裡，三類入聲韻尾已開始混合成一類並弱化為喉塞音韻尾，<sup>21</sup>而「入派三聲」可能已在某些方言裡浮現。

因此，慈賢譯師此處「蜜多」之譯，其非順古而為新翻，或是為當時的抄手無心竄入的可能性，似乎也可以同時列入考慮，雖然在語段三三的對應脈絡裡石經乙本則與其甲本相同而皆作「弭跢」。

其次，從近代音的音讀變化來看，石室丁本裡的「迷」，也同樣值得注意。首先，該一字詞的用例在五件石室抄本裡但只在此出現過一次而已，而「弭」則在這五件抄本其他脈絡中，相當一致地或用以對譯梵語鼻聲音節 **mi**，或用以對譯 **me**，不一而足。並且，在《慧琳音義·卷一·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初分緣起品之一》「釋經題本梵語」中，更述及了西元八世紀長安方言裡對 **prajba-paramita** 一詞的標準音讀：「般一音鉢。本梵音云：鉢囉二合。囉一取羅字上聲，兼轉舌即是也。其二合者，兩字各取半音，合為一聲。古云：般者，訛略也。若一而者反。正梵音：枳孃二合。枳，音雞以反；孃，取上聲。二字合為一聲。古云：若者，略也。波一正梵音應云：播一波箇反，引聲。羅一正梵音應云：囉，准上取羅上聲，轉舌呼之。蜜多一正云：弭多。弭，音迷以反。具足應言：...鉢囉二合枳孃二合播引囉轉舌弭多。」(T54，頁

<sup>20</sup> 參見李新魁 (1997)，頁 153~155。

<sup>21</sup> 參見王力 (1985)，頁 307。

313c)。

因此，如果以《切韻》一系的中古音來看，明母齊韻的四等字「迷」，其音讀顯然難以稱得上是呼應了梵語鼻聲音節 **mi**；但是若順《中原音韻》一系的近代音來看，則它的音讀便可說符合了其所對譯的梵語音節了。石室丁本會是口操《中原音韻》一系北方方言者之所為嗎？從石室封洞的可能年代來看，晚至西元十三、四世紀的推斷當然是荒謬的，但是抄手這個不經意流露出來的語音，難道不會令人起疑！尤有甚者，乃是前文已然分析過的，該件抄本以中古音讀為濁塞雙唇音的「婆」來對譯梵語清塞雙唇音 **p**，以濁齒塞音的「馱」來對譯梵語清齒塞輔音 **t**。

總之，我們或可由前述「播、婆」之異，乃至「哆、馱」之別，而見出丁本似乎傾向於用中古音的濁聲母字來對譯當屬清聲母字的梵語音節。然而，這種梵語清塞音在漢音轉寫過程裡被濁化的現象，似乎並不合於中古時期以《切韻》乃至《廣韻》音系為中心的大多數佛經音寫現象，並且也和已知的不空音寫系統不合。但是，當這種現象大量而並非規律性的出現在石室抄本之際，則多少可以說明這些抄本在展轉傳錄的時候，其間有著抄手逕自以當時一己的方音進行竄亂的情事發生，而從其以原屬中古音並、定兩母的「婆」、「馱」來對譯梵語清塞音的 **p**、**t**，如果說這兩項擬音是成功，那就等於是說「婆」、「馱」的音讀已然各自歸入了幫、端兩母。石室丁本裡這種有著濁音清化傾向的方言，與高田時雄 1988(頁 108)所嘗試描寫的敦煌地區該一時期的聲母體系是極其吻合的。

當然，這種濁音清化現象的頻出，同時也是北宋時期中原地區漢語聲母系統裡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竺家寧教授在描述中古後期漢語音韻變化時也特別強調：「宋代的三十六字母中，有一整套的全濁聲母...可是在實際語言中，這套全濁聲母已傾向消失，變成了清聲母」，<sup>22</sup>此外李新魁教授聲母在〈宋代漢語系統研究〉一文裡，也提出了相同的論點。<sup>23</sup>因此，石室丁本裡這種濁音清化的傾向，對於該一抄本寫成年代的定位來說，當該是具有極其關鍵的意義。

此外，就 **paramita** 的漢音轉寫形式而言，奘師出之以「波囉弭多」，前已陳明；而菩提流志、不空三藏，乃至石經乙本的譯者慈賢法師在其傳世譯籍

<sup>22</sup> 參見氏著《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頁 417。

<sup>23</sup> 參見氏著前揭書，頁 123~125。

裡，則都以「播囉弭哆」來轉寫此一梵語，<sup>24</sup>雖然其間菩提流志也曾例外的出現了一次「播囉弭跢」的語形。<sup>25</sup>由此可見，石經甲本與東寺本此處的「弭跢」，乃至石經乙本的「蜜多」，其原初的漢字語形或有可能皆為「弭哆」。此外，石經甲本對「跢」字的音注，則採漢地聲調的「上」來提示其音讀。然而，此一音讀提示是就梵語音節實際音讀的「音高」與「升降」來說？還是就「音長」而論？如果單就後者，也許使用「引」將更為恰當一些。事實上，如果石經甲本此處的「上」是用來標注原語段的長音節 *ta*，則也符合不空三藏傳世譯例裡以「平、去」譯長元音，而用「上、入」譯短元音的情況。<sup>26</sup>或許此處的「上」並不指「音長」，而是就持咒之際誦讀上聲調的「升降」來說的。<sup>27</sup>

又、在現存的《心經》音寫文本中，以漢地音節裡超音段的平上等調號來標示梵語音讀裡的對應成分，則但見於石經甲本而已。

**注三** 甲丙戌三本共東寺本作「紇哩」，乙本作「紇里」，丁本作「阿栗」，石經二本作「[口+紇]哩」。

按：「里」與「栗」，同屬來母。在北周時期闍那耶舍所譯出的《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之中，其間有雙排小字夾注：「咒文中字，口傍作者，皆轉舌讀之」(T19, 頁 509b)。因此，諸如「[口+栗]」或「哩」之類的字詞，基本上乃是因應譯經之需而由漢地譯家撰造出來的新字，而在有唐一代的傳譯活動裡，特別是在密咒的逐譯過程中，這些別出新裁的字詞便經常為譯家們用以模擬中古時期漢語音韻系統裡所沒有的梵語顫音 *r* 或 *ri*，並且諸如此類的來母新造字詞幾乎成了對譯梵語顫舌音的專屬用字，譬如語段四，對 *caryam* 而譯為左哩焰，乃至語段十六，對 *wariputra* 而譯為捨哩補但囉，皆屬此類。這種以漢語音韻裡的來母模擬梵語顫音 *r* 或 *ri* 的轉寫手法，或許其初只是基於音近而替代的權宜之計；然而，一當這些專屬用字的規律性被人為地確立起來之後，則它們仍然可以視為具有「音位轉寫」(phonemic transcription)上的意義。就此而言，乙本的「里」與丁本的「栗」，或許在有唐一代都只能看成是審音不當的出格用法，而由此亦可見出丁本的抄錄當非

<sup>24</sup> 流志譯例或可參見《大正藏》，T20，頁 307a；不空譯例則相當一致均作「播囉弭哆」，其譯例參見《大正藏》，T18，頁 321a；慈賢譯例則見於《大正藏》，T20，頁 905a。

<sup>25</sup> 其譯例參見《大正藏》，T20，頁 317a。

<sup>26</sup> 參見劉廣和(1994)，頁 55。

<sup>27</sup> 參見劉廣和(1991)，頁 26。

出於唐五代的譯場之中。

又、「紇」爲匣母字，而「[口+紇]」則當依前述所謂「口傍作者，皆轉舌讀之」的通例，而視之爲是因應譯經之需而撰造出來的新字。事實上，該字也經常和「哩」以二合的連用方式來對譯梵語清擦音音節 **hrih**。按：「[口+紇]」，《改併四聲篇海·口部》引《俗字背篇》：「[口+紇]，下沒切，[口+紇]哩，出《釋典》」。實則，此處的「[口+紇]哩(**hrih**)」，亦作「紇哩」。《慧琳音韻·卷十》釋《理趣般若經》：「『紇哩二合』，真言句也。上紇字，無反音，取痕字入聲；下哩字，轉舌」。因此，以「紇」或「[口+紇]」之類的匣母字來對譯梵語清擦音 **h**，自有諸多古譯乃至新譯的前例可援以爲證，並且在西元十世紀的河西方言裡，也仍然以中古漢語曉匣兩母來對譯這個梵語清擦音 **h**。<sup>28</sup> 因此，丁本作「阿」，若非抄手之誤，則該字乃屬影母，以之對譯梵語清擦音 **h**，則似乎在有唐一代的譯例裡還未曾見到。當然，若「阿」爲「何」的誤抄，則又另當別論。蓋西元十世紀的河西方言中「何」的音讀雖爲曉母，而與《切韻》音系歸爲匣母不同，<sup>29</sup>但義淨與不空等人也都是混用曉、匣兩母以對譯梵語清擦音 **h**。<sup>30</sup>

我們此處雖然可以如同上文所述而視丁本的「阿」爲抄手因於「阿、何」的形近而來的誤筆，如此則文本之間的音韻落差似乎也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但若是該一抄本的「阿」並非抄手之誤的話，則我們就有必要重新考慮丁本以影母的「阿」來對譯梵語清擦音 **h** 在音韻上的可能意義了。張清常先生在分析石室〈婆羅迷書體·金剛經對音殘卷〉已然指出該一抄本是以零聲母對譯中古漢語影紐，而從材料上來看，「阿」等還保留了喉塞聲母。<sup>31</sup> 如此一來，丁本採零聲母的「阿」，則可能表示在當年實際誦讀的時候，梵語清擦音 **h** 在語流音變裡出現了「減音」現象。

**注四** 丁本連上文作「阿栗那夜·」，其餘石室抄本均作「那野」，東寺本連上文作「紇哩那野·」。石經甲本作「乃野」，石經乙本作「那野」。

按：「那」，即「那」的敦煌俗體字。《五音集韻·歌韻》：「那，俗那」。《字彙補》作「諾何切」，《文選音》作「乃何[反]」，爲泥母字。至於石室抄本「那」的其他異體，則可直接參照張涌泉 1996(頁 572)，以下基於操作方便，將一

<sup>28</sup> 參見張清常(1963)，頁 71。

<sup>29</sup> 參見高田時雄(1988)，附錄 3「資料對音表」0018。

<sup>30</sup> 參見劉廣和(1994)，頁 45。

<sup>31</sup> 參見張清常(1963)，頁 72。

律使用「那」來表示該字為敦煌俗體的「那」。

又、東寺本「紇哩娜野」的語形，於 CBETA 的錄文裡但只在傳為大廣智三藏和上<sup>32</sup>於含暉院承明殿道場說《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中一見：「夫修行者初發信心，以表菩提心，即大圓鏡智。紇哩娜野心，是眾生內心」(T18, 頁 292a)。由於梵語 *citta* 與 *hrdaya* 的漢譯皆作「心」，因此為了簡別菩薩「菩提心」(*bodhi-citta*)與眾生「肉團心」(*hrdaya*)的分別，因此在解說的過程裡解說者便以合璧方式而把「眾生心」稱之為「紇哩娜野心」。此處或可暫不論列「紇哩娜野」的語形是否出自不空三藏，蓋這並無礙於「娜」之為泥母也。

因此，從前開各本的對照裡，我們便可清楚見出梵語原初語段的 *daya* 和「那野」、「娜野」、「那夜」以及「乃野」之間在語音對照上所出現的落差。此中，丁本與其他諸本之間的「夜、野」之差，則無甚緊要，蓋二者皆為喻四(或稱以母)，都可以用來對譯梵語半元音音節 *ya*。

至於在梵語濁塞音音節 *da* 的對譯上，當時譯家何以都一致選用了中古漢語音讀為泥母的「那、娜、乃」一類的漢語字詞來對譯它呢？這些泥母字基於何種原因而可以拿來對譯梵語濁塞音 *d*？事實上，這種佛經音寫詞裡的奇特現象，一早便曾經在古譯時期裡出現過，只是它時斷時續，若現還隱，因而竟逃過了眾家的眼目。在俞敏的〈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裡，其 *da* 的對音，除支婁迦讖所出的定母字「曇」外，另有支謙所出的泥母字「那」，<sup>33</sup>但先生似乎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論列。

當然，眾所周知的，是法國漢學家馬伯樂首先觀察到不空譯籍裡的這種特殊音寫現象，但及至羅常培與張清常等前輩學者先後以石室抄本為中心而致力於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乃至隨著葛毅卿對隋唐音韻的講論，<sup>34</sup>特別是當高田時雄、劉廣和與柯蔚南諸學者相繼發表了他們的相關研究之後，這項奇特的梵漢對音現象才逐漸被落實為是西元八世紀之後包括長安方言在內的西北方言裡的音韻特徵之一。

在傳世的佛典文獻裡，採用泥母一系列的「那」而未以定母出字對譯梵語濁塞音音節 *da*，如今已然被視為是不空三藏以漢音轉寫梵語之際所流露出來

<sup>32</sup> 從此一名銜來看，當指不空。

<sup>33</sup> 參見俞敏(1984)，頁 314a。

<sup>34</sup> 參見葛毅卿(2003)，頁 109~113；葛氏之說在當年的學界似乎較不為人所知，蓋人既微而其言則難重矣。

的音寫特徵，這當然必須歸功於諸多前輩學者辛勤的耕耘。雖然這項語音特徵一早便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在1920年〈唐代的長安方言〉的論文裡被指認出來，但是劉廣和1984與1994兩篇論文則更細緻地證明了不空音譯系統裡的確存在著鼻音聲母帶有同部位的濁塞音現象，而該項語音特徵基本上則反映出了西元八世紀左右長安音鼻聲母音讀的特質。事實上，高田時雄1988(頁86~93)也明確指出在西元十世紀河西方言的聲母系統裡，其鼻音聲母的音值也仍然帶有同部位的濁塞音成分。雖然如此，但是關於此一語音現象在漢語音韻流變史的意義，則似乎仍然處於爭論之中，而目前在這個問題上較新的研究，大體認為它乃是上古漢語鼻塞複輔音聲母分化過程裡的一個過渡現象。<sup>35</sup>

再者，在有關梵語 **hrdaya** 漢音轉寫的語形上，除了前揭石室本、東寺本乃至石經本的數種不同形態之外，依 CBETA 的錄文，則早在不空三藏抵華之前，承繼玄奘遺志而匯編譯成《大寶積經》的菩提流志(Bodhiruci)在其所譯的密咒裡已經採取了諸如「紇唎娜野」的漢音轉寫形式(T20, 頁 245a)。至於稍後抵華的不空三藏，則在其傳世的密咒譯籍裡，針對 **hrdaya** 的漢音轉寫而出現了以下幾項並不完全相同的漢字語形<sup>36</sup>：「紇唎那曳娑摩 悉體汀以反哆」(\***hrdaye samavasthitah**; T18, 頁 218a)、紇唎娜闍(\***hrdayam**; T18, 頁 218b)、紇唎娜焰(\***hrdayam**; T20, 頁 432b)。這幾項不空的漢字音寫詞明顯地與目前我們所見到的石室本和石經本的音寫並不相類，反倒是更近於菩提流志前揭的轉寫形式。此外，尤其值得特別留意的，乃是石室夾注本「紇哩那野」的音寫形式，卻可以在趙宋時期施護等人所譯出的密教典籍裡找到：「『二手相合金剛縛，二臂堅固住於心，其諸指面如金剛，於自腋間而振擊。』如是印明，即能攝取一切有情紇哩那野而為所食」(T18, 頁 373a)。因此，這些音寫用詞上的差異，對於譯者歸屬問題的討論，或是對石室抄本或石經甲本的寫成年代的釐定，當該具有一定的廓清作用吧！

**注五** 石室夾注三本「素怛囉」，丁本作「素怛囉·」，戊本作「素怛囉」，東寺本作「素怛囉、」。石經甲本作「素怛囉二合」並另夾有「已上經題」的注記，石經乙本作「素怛囉二合」。

<sup>35</sup> 參見王珊珊，〈梵漢對音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古漢語研究》第一期（長沙：古漢語研究雜誌社，2003），頁 14~19。

<sup>36</sup> 以下漢文語段裡的末尾音節在用字上的出入，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它們基本上是反映了梵語裡的「格尾(case endings)」而已。

注本則於「素怛嚩」下皆未見「二合」之注。

按：此中，「素」，《廣韻》作「桑故切」，心母暮韻去聲，乃遇攝合口一等字，其中古擬音爲/s u/。後漢三國以降而至有唐一代的義淨與不空，乃至西元九・十世紀的河西方言也都以心母出字對譯梵語清擦音 **s**。<sup>37</sup>然而，此處關於梵語長音節 **su** 的漢字音寫，諸本則皆未於「素」下夾注「引」以示之。在這一點上，CBATA 的相關錄文亦皆如此。由此可見，在新譯時期的諸多密咒音寫者之間，乃至在石室本或石經本的抄手群裡，或許認為去聲合口一等字的「素」業已充分表達了梵語長音節 **su** 的音讀吧！<sup>38</sup>至於在新譯時期裡的漢字音寫梵音的過程之中，是否同時反映了中古時期漢語韻部裡其韻腹之中存有長元音的問題，加拿大籍的漢學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等人似乎是持肯定的立場，<sup>39</sup>而陳淑芬教授則於其新近發表的〈Vowel Length in Middle Chinese Based on Buddhist Sanskrit Transliterations〉文章裡，批評了蒲氏的立論並認為其說法在佛經音寫詞裡並無法得到支持。<sup>40</sup>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此處則不擬涉入討論。

至於「怛嚩二合」中的後聲，亦即「嚩」，該字《漢語大字典》失收。若如東寺本作「覽」而去口字偏旁，則《廣韻》作「盧敢切」，來母敢韻而收鼻聲韻尾 **-m**。又、由於 **sutra** 爲中性名詞，因此作爲經題而出現之際，其唯一可能的語形便是 **sutram**，而慧琳則將此一語形皆音寫爲「素怛纜」。《慧琳音義・卷四十一》：「素怛纜，下藍陷反，梵語也。唐云『契經』，古譯或云『修多羅』，皆梵音訛轉也。」(T54，頁 576a)如此，則「覽、纜」，同屬來母而皆收鼻聲韻尾 **-m**。至於「囉」，《廣韻》作「魯何切」，來母歌韻；《集韻》作「利遮切」，來母麻韻。以上兩讀皆爲開音節，而由此或可見出石經乙本其藉以音寫的原初語段極有可能只是 **sutra**。至於 F 本於此逕自將石經乙本的「囉」還原作 **ram**，我們以爲這項還原似乎是欠缺了漢梵音韻對勘上的理據。

又、「嚩、囉」等之音讀，或當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小字夾注所云：「羅利盧栗黎藍等字，傍加口者，轉[舌]聲讀」(T19，頁 354a)。由於漢語音韻系統裡，並無對應梵語 **r** 或 **r̥** 之類的顫音，因此在採用發音相近的來

<sup>37</sup> 參見俞敏(1984)，頁 281；劉廣和(1994)，頁 45；張清常(1963)，頁 68。

<sup>38</sup> 參見劉廣和(1994)，頁 55。

<sup>39</sup> 參見氏著《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1984。

<sup>40</sup> 陳教授此文參見《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四卷第一期(2003)，頁 29~45。

母字對譯時，爲了要和梵語邊音 **l** 與 **l̥** 的對譯漢音有所區別，便採取了來母一系而附加口字偏旁的漢字以模擬梵語顫音 **ṛ** 或 **ṛ̥**，並以未加口字偏旁的來母字對譯梵語邊音 **l** 與 **l̥**。

**注六** 甲本夾注作「經」，乙丙二本作「經□」。又、依漢地昔日譯場的結構以及譯經的流程來看，則多少都可以見出不論是石室本或是石經本，這一類《心經》音寫本的存在形態，在正規的譯經流程裡原初當該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半成品而已。這個還正處於生產線上的「半成品」何以會私自從「工廠」裡流出？其間的詳情如何，或非我們今日所能知曉。但無論如何，理解整個漢譯佛典的生產流程，對於漢譯佛典的語言學解明來說，則應該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在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業已蔚爲主流的今天，對這些佛經文本的產製流程多做一些瞭解，或將更有助於此一學門的知識開展。因此，筆者不憚煩瑣，願藉此區區一隅引錄前賢之說，而由此也可以讓我們對石室《心經》音寫抄本題記裡所引「生的閏色」或「不閏色」的問題，多少增加一分認識。

《佛祖統紀》成書於西元十三世紀，該書的作者是南宋時期天台宗的學問僧志磐，在這部著作的第四十三卷「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T49, 頁398b)，志磐就曾經以《心經》的翻譯爲例而詳盡地描述了北宋時期的譯場組織及其翻譯流程：

天息災述譯經儀式.... **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hrdaya** 初翻爲「訖哩第野」，**sutram** 爲「素怛覽」。**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訖哩那野」再翻爲「心」，「素怛覽」翻爲「經」。**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云：「照見五蘊彼自性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後所，如「念佛」爲「佛念」、「打鐘」爲「鐘打」，故須回綴字句，以順此土之文。**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如「無無明無明」，剩兩字；如「上正遍知」，上闕一無字。**第九潤文**，官於僧眾，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如《心經》：「度一切苦厄」一句，元無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兩字，元無梵本。

以上志磐所述雖爲趙宋譯場的譯經流程，然而有宋一代的譯場組織，在

架構上大體循唐制而來，並無太大改變。<sup>41</sup>志磐文中所謂「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hrdaya 初翻爲訖哩第野」，尤堪注意。因爲它多少也說明了以泥母的「那」對譯梵語濁塞音 **d** 的特殊音譯現象，或許並不牽涉「源頭語」(source language)的雅言或方音之別，而卻與「目的語」(target language)中漢語社群裡西北地區因於移民遷徙而造成的方言更迭有所關連。

再者，此中志磐所謂的「潤色」，似乎是特指對譯本進行原典所無的「增益」而言，而不僅僅是一般所謂「施以文采，增美其辭而求煥然可觀」的意思而已。至於贊寧所論譯場經館的設官分職，其中所謂「潤文一位，員數不恆，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sup>42</sup>則似乎又與志磐所言有所差別。蓋此中贊寧所言之「潤文」，其職司乃在文言俚俗等語文層次上的潤色或整飾，換言之，但在增美其文采而令之煥然而已。然而，從志磐引述《心經》傳譯之例來說明「潤文」之職來看，則是指思想層面上參詳潤色而增益某些原典所無的文字以暢達其義理，兩者之間似乎是有不同的。至於其間孰是孰非，此處不擬深究，且留待他日再行詳考。

## 2.aryAvalokitevaro(1) bodhisattvo

(1) A本： vara-bodhisatvo.

阿[引]哩也二合[引](注一)聖[注二]囉嚕[引](注三)觀枳帝[引](注四)自濕囉  
[二合]路[引](注五)在冒[引]地[注六]菩娑怛侮[二合引](注七)薩[二]

注一 甲乙丙三本並石經乙本作「阿哩也二合」，石經甲本作「阿上哩也二合」，丁本作「阿也·」而略去「哩」，戊本作「阿徐你也反」，東寺本作「阿哩也、二合」。

按：若依劉廣和 1994(頁 55)，不空傳世譯例的音注多以漢地「平、去」調值表梵語長元音(尤以後者居多)，而以「上、入」調值表梵語短元音(尤以後者居多)；換言之，其譯例中多以「阿上」表梵語短元音 **a**，而以「阿引去」或「阿去」表梵語長元音 **a**。然而，與語段[ ]以「踰上」對譯梵語音節 **ta** 的情況一樣，石經甲本此處的音注似乎與前述體例並不相合。然而，以漢語「上

<sup>41</sup> 參見曹仕邦(1990)，頁 27 以下。

<sup>42</sup> 《宋高僧傳》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初版第一刷)；(北京：中華書局，1996，初版第三刷)，上冊頁 57。

去」等聲調來標注梵語音讀，或許不單是指「音長」而言，也有可能是就「音高」或「升降」來講的。劉廣和1994(頁55)曾推測不空三藏用「上」來表高平或高升調，而以「去」表高降調。至於戊本的「你」以及其音注「你也反」，下文詳之。

「你」，《慧琳音義·卷三十五》釋《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第一卷》作「寧頂反(/n i e ŋ /)」；《廣韻》作「乃里切」，泥母止韻，其中古擬音為/n ĭ ə/。如是則不論戊本夾注的「你也反」，或是《廣韻》所出的「乃里切」，其韻部之間或有出入，但其聲母則都同於慧琳所出音讀的切語上字「寧」，而皆為泥母字。丁本何以用泥母的「你」字來取代傳統上的來母字呢？以下且試論之。

丁本此處一如其前的情況而略去了轉寫梵語顫舌音 **r** 的「哩」，而戊本則並未襲用傳統上以來母的「哩」對譯梵語顫舌音 **r** 的音近替代方式，改以泥母三等字的「你」來著手對譯，並以夾注特殊切語的方式提示其音讀。此處所謂「特殊切語」，是指該一切語並非襲自漢地傳統的韻書，而是基於對譯漢語音節結構中原初所沒有的那些梵語音節而臨時撰造出來的，這一點正如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三》所謂：「既無正體，借音言之。」(T54, 頁222a)然而，問題是「你也反」的切語能夠切出梵語顫舌輔音串音節 **rya** 的音讀嗎？還是說泥母字的音讀在夾注作者或抄手的方言裡，能夠和傳統的來母字一樣模擬出梵語顫舌音 **r** 的音讀呢？若依傳統諸如《切韻》或其後《廣韻》音系所示，前者的答案，自是可想而知的，但後者的可能性或許會高一些吧！

當然，此處戊本若以「你」的音讀/n ĭ ə/而對譯梵語顫舌輔音串音節 **rya**，<sup>43</sup>則是將梵語「哩也二合」的後聲 **y** 視同漢地介音 / ĭ / 來看待。如此一來，則戊本此處便如同石經乙本在語段□裡以「倪也二合」對譯 **jba** 的情況一樣，都可能涉及了漢地式的音節重組，而這種情況在不空譯場裡則罕見其例，但這種音節重組的手法卻在趙宋時期的譯場裡極為常見。石室夾注本皆未見以「反切」等漢地音注來進行音讀提示的，而戊本僅見的反切音讀例則多有涉及漢地式的音節重組。這似乎也構成了戊本的特色之一。至於漢語鼻音聲母 **n** 與梵語顫舌輔音 **r** 是否可以具有相同音值的問題，以下且嘗試之。

事實上，由於梵漢兩種語言各自有其不相繫屬的語音系統，而其語音間

<sup>43</sup> 此處或可先不論其間漢語鼻音聲母 **n** 與梵語顫舌音 **r** 是否在音值上可以等同的問題。

的組合規則也不必然彼此存有可資對應的關係，因此以來母字對譯梵語顫舌音 **r**，也就是由邊音到顫音(**l>r**)，只能說是一種梵漢之間語音轉換過程裡的音近替代現象。但是，從來母轉為泥母，也就是由邊音變為鼻音(**l>n**)，則由於兩者發音部位相同(皆為舌尖中音)，而只是發音方法有別，因此或有可能互相轉化。根據王力等人的研究，在漢語地區的某些方言裡，也的確存在著 **l>n** 或是 **n>l** 的音位互換現象。<sup>44</sup>因此，戊本此處以泥母的「你」替換來母的「哩」，抄手或許是考慮到了誦讀者當時所操持的實際語音。換言之，由梵轉漢的 **r>l**，乃是音近替代現象；而由 **l>n**，那就是一種漢語社群裡的方言現象了。

然而，邵榮芬 1963(頁 287)則指出泥、來的代用例在八至十世紀的敦煌郡還是極其罕見的，而那些少數換用的例子「似乎還不夠證明當時泥、來已經合併，至少這種現象在當時是不普遍的」，而高田時 1988(頁 100)更指出：「來泥交替之例，極其罕見，河西方言的來母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聲母。」那麼，究竟是哪一種漢地的方言有著前述那種 **l>n** 的音位互換情形，這就不是個人目前所能夠知道的了。<sup>45</sup>此外，根據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裡的說法，<sup>46</sup>他則以[ĩ]來描寫鼻音 **n** 和邊音 **l** 相互混同的音值，並且說：「這個 ĩ 音在運城(山西省)宜昌跟揚子江流域的許多地方往往都可以遇見的。」不過在同書頁 358 以下，高本漢一方面認為 **n>l** 在中國境內的幾個方言裡都佔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相反的，由 **l>n** 的變化在中國境內的方言裡只有極為零星的例子，而其所佔的地位也並不顯眼。

注二 甲丙二本夾注作「二合聖」，乙本則作「聖二」，疑抄手於此奪文而當作「聖二合」。

注三 石經本皆作「囉路」，石室諸本則作「囉嚕」，而兩者皆未於「路、囉」下置音讀夾注。東寺本雖於「囉嚕」下有「二合」之注，然而若就原文語段 **valo** 而言，即使置入了「二合」的音讀提示，這也是一個不當的音讀提示。蓋對譯梵語邊音結合長元音所構成的長音節 **lo** 時，則依通例當於「路」或「嚕」下夾注「引」字，方可稱之為提示了該一音節的確切音讀。再者，「路、

<sup>44</sup> 參見王力(1985)，頁 538。

<sup>45</sup> 邵榮芬 1963 引《甘肅方言概要》所述，現在只有甘肅天祝以西的民勤與安西兩地的方言裡泥、來不分，而這兩個地區在有唐一代並不隸屬敦煌郡。以上見前揭書，頁 287。

<sup>46</sup> 參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縮印第一版；2003，第二刷)，頁 176。

嚕」雖然皆為來母，但前者暮韻去聲，後者則為姥韻上聲。依語段[一]注一所引譯家審讀梵語邊音 **l** 與顛音 **r** 的判分通例：「羅利盧栗黎藍等字，傍加口者，轉[舌]聲讀」，則或以石經本以「純正」來母字的「路」對譯梵語邊音音節 **lo** 較為適切。再者，依劉廣和 1994(頁 55)，在有關梵語長元音的漢音轉寫上，不空音注裡的去聲則較之上聲的音程來得更長一些。劉廣和教授的這種聲調比對，似乎也可以印證我們以上的推斷。雖然如此，石室本與石經本在處理梵語邊音音節 **lo** 與顛音音節 **ro** 的音寫之際，彼此之間似乎存在著對立的情況。在目前語段裡 **lo** 與 **ro** 的對譯中，以及在語段[五]處理 **lo** 的音寫時，兩系之間似乎都明顯地呈現出了這種「路」與「嚕」音寫上的彼此互調，而石經甲本與石室抄本之間尤為如此。這種規則性的對立現象，或非偶然。至於其理安在，則有待於高明。

**注四** 甲戌二本作「拈帝」，乙丙丁三本作「拈啼」，石經本作「枳帝」而乙本「帝」下來有語段編碼[三]。

又、丁本連上文作「嚕嚕拈帝·」，東寺本連上文作「嚕嚕枳帝·」。按：石室諸本的「拈」，或當依石經本與東寺本改作「枳」。至於「帝、啼」之間的出入，則在於清濁有別。以下且先論此中之前者。在語段[一]注一裡，關於「枳孃」一詞中「枳」的音讀問題，我們曾引述柯蔚南 1994 之說，亦即在《慧琳音義》裡，該一漢字章母一系的音讀但只出現於專名中，而見母一系的音讀則用於梵語字詞的漢音轉寫，並且其間的多數情況該一漢字的語音是用以對譯梵語清塞音音節 **ki** 或 **ki**。就目前語段中梵語清塞音音節 **ki** 的音寫而言，石經二本與東寺本的「枳」，也正反映了柯氏所說的這項西元八世紀長安方言音寫梵詞的特點。然而，石室諸本的「拈」，《廣韻·紙韻》作「諸氏切」，乃章母字。若依《集韻·蟹韻》的又讀「仄蟹切」，則為莊母字。即使此處的「拈」為「擻」的俗體，它也是昌母字。以章、莊、昌三母出字對譯梵語清塞輔音 **k**，似乎和已知的中古時期佛經音寫體例並不相合。因此，石室諸本的「拈」，或為「枳」的形近之誤。

再者，關於石室本之間「帝、啼」的出入，則唯在其清濁之別。此中，前者屬端母，而後者為定母。當然，若只就梵語清塞音音節 **te** 的對譯來說，自是端母的「帝」比定母的「啼」來得更為適切，而石經本此處亦作「帝」，或可為證。此外，在語段[一]注六所提及的另外一件伯四五七七號石室殘卷中，也是採取了端母字的「諦」來對譯梵語清塞音音節 **te**。事實上，在 CBETA 所錄《大正藏·密教部》裡，乃至整個「印度撰述部」的正文部分(亦即隨頁

對照註記不算)，也找不到「呷啼」這個「錯誤音讀」的譯例。因此，乙丙丁三本作「啼」，若從西元七、八世紀西北方言的聲母系統來看，若判之為抄手之誤，或無疑義；並且，這個「訛字」也可以用來說明乙丙丁三本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密切關連。

然而，另外一種可能性似乎也是不可輕忽的。那就是在中古音《切韻》系的音讀裡，原屬定母的「啼」，在抄手書寫該一文本之際，其實際口語音讀是否已然清化為端母字了。事實上，這種濁音清化的現象，根據邵榮芬 1963(頁 292 以下)與高田時雄 1988(頁 108)的研究，的確就是西元十世紀河西方言的語音特徵。

因此，與其但視乙丙丁三本作「啼」為抄手之誤，充其量只能說明乙丙丁三本之間或有其傳承關係，還不如把這個「訛字」視為是濁音清化時代的產物，而這種音韻變化的現象，若是隨著它在石室抄本裡的遞增，<sup>47</sup>則對於石室抄本寫成年代的上限，便具有決定性的指標作用。

又、雖然石室夾注本與房山石經本一樣，均未於「枳帝」下作小字夾注「引」，但若依趙宋時期嚴格的夾注體例，實應於「枳帝」下作小字夾注「引」。就 CBETA 所收《大正藏·密教部》的密咒錄文來說，在「枳帝」下附有夾注「引」的密咒，甚至還包括不空三藏的傳世譯籍。<sup>48</sup>因此，在《心經》音寫本正文部分的譯者歸屬問題上，但依小字夾注的有無乃至其夾注的內容為判準，似乎並不一定具有任何決定性的證明效果。

**注五** 丁本作「濕囉路·」，東寺本此處作「濕囉洛、」。<sup>49</sup>又、石經本此處作「濕囉二合嚕」，而石室夾注本於「濕囉」下則未置任何音讀提示。此中，「路」與「嚕」在音寫梵語顛音音節 **ro** 之際，其間的對立情況，則一如前揭語段□注三所言。基本上，仍然是石經本的音寫與音讀提示較之石室本所出者來得妥貼。又、石經乙本「嚕」下夾有語段編碼□。

又、E 本此處或據石經甲本的「囉嚕」，而將此二音節逕自還原為 **valo**，但 F 本卻又在相同的脈絡裡把石經乙本的「囉嚕」，還原為 **varo**。不知其間是否為手民誤植，或是福井教授有更為堅強的理據而分別做出了前開這兩種不同的還原？

**注六** 石室本並石經本皆作「冒地」，丁本作「冒地·」，東寺本則於此處作

<sup>47</sup> 這一點在語段□注二裡，已然論之甚詳。

<sup>48</sup> 譯例與夾注或可參看《大正藏》No.1056, T20, 頁 82b;《大正藏》No.1111; T20, 頁 789b。

<sup>49</sup> 此一語形則有可能反映了其當年所據之底本與法隆寺梵本 **wara-bodhi** 同出一系。

「菩地」而未施加間隔符號。

按：「冒」，《廣韻》或作「莫報切」，或作「莫北切」，其音讀皆屬明母；至於東寺本的「菩」，《廣韻》作「薄亥切」，則為並母字。就原文語段 *bodhi* 的音寫而言，此處或可暫不討論中古時期全濁是否送氣的問題，而以定母的「地」對譯梵語送氣濁塞音音節 *dhi*，則諸本之間都無出入。但是，以中古音讀的鼻聲明母出字對譯梵語濁塞輔音 *b*，則多少便顯得有點蹊蹺了。

從《切韻》一系列的韻書來看，東寺本以中古音讀的並母字「菩」來對譯 *b*，當然是相當妥貼的，而玄奘與義淨的音寫系統也正是如此。然而，這種情況一旦轉至西元八世紀的長安方言，或是九、十世紀的河西方言，或許情形就變得不一樣了。因為，鼻音聲母帶有同一部位的濁塞音成份，事實上正是此一時期西北方言的主要特徵之一。在語段□有關 *hrdaya* 的對譯裡，我們已然見到了石室本與石經本以泥母的「那」來音寫梵語濁塞輔音 *d* 的情況，<sup>50</sup>而此處石室本與石經本則又以明母的「冒」來音寫梵語濁塞輔音 *b*。這些情況基本上都表明了諸如劉廣和 1984(頁 3 以下)與 1994(頁 44)，乃至高田時雄 1988(頁 89)與張清常 1963(頁 65)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此處石室本與石經本的情況。因此，反倒是東寺本以並母的「菩」對譯 *b* 的情況，值得我們注意了。因為根據施向東 1983 與劉廣和 1994 的研究，這種以並母出字對譯梵語濁塞輔音 *b*，乃是玄奘與義淨等人的音寫方式。

又、石室抄本伯四五七七號是一件疑似「經折裝」的佛經殘片，採「兩面抄」的書寫形式，其背面為《法華經·卷七妙音菩薩品》的殘片，而正面則題作《大明咒藏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這件僅存殘片的敦煌卷子的正面但只錄有四行文字而已。其中的首行，即是前揭名為「大明咒藏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題，第二行則是與法隆寺貝葉抄本頗為近似的梵字悉曇，而以直行書寫：*aryavalokitevaro bodhi*，其左側便是該一梵文語段的漢音轉寫，同時還另外附有詳盡提示音讀的小字夾注：「阿引哩野二合囉路引枳吉以反諦濕囉二合嚕引冒地」。至於第四行，又換為直行的梵字悉曇：*bodhisatvo gambhiram prajapara*。<sup>51</sup>這件僅存殘片的石室抄本或許是另外一個《心經》音寫抄本，可惜我們今日已無緣窺見其內容了。雖然如此，但若以其疑似「經折裝」的裝幀、詳細的音讀夾注，乃至看似工整的準「寫經體」，這些似乎都足以顯示這件僅存殘片的抄本當年或有可能是出自行家之手，而和五件石室

<sup>50</sup> 參見語段□注四。

<sup>51</sup> 此處的梵字悉曇其中有部分文字是勞請徐立強先生代為解讀，謹此聲謝。

《心經》音寫抄本迥不相類。

此外，在石室夾注本中，其音讀提示的內容則一概都無切語，也無平上等聲調的標記，而與「石經乙本」頗為相類，但卻迥異於「石經甲本」，蓋後者的音讀提示則時有切語與平上等聲調的注記穿插其間。

**注七** 甲乙二本作「娑怛侮」，丙本作「婆怛海」，丁本作「娑怛梅·」，戊本作「娑怛海」，東寺本連上文而作「菩地娑怛囉、二合」。<sup>52</sup>石經甲本此處作「薩怛舞二合[ ]」，石經乙本作「薩怛舞二合[五]」。又、甲本從上文的「鉢囉識攘」而至此處的「娑怛侮」，前後重文，亦即《敦煌寶藏》冊十九，頁 689a 末二行與頁 689b 起頭兩行內容全同，故而 689b 第三行題頭處便有抄手書以“\*”而示自此開始。

按：關於「侮、海、梅、舞」四者之間的差別，乃在「侮、舞」皆屬微母，「海」為曉母，「梅」則是明母。因此，「海、梅」二字或屬抄手形近而訛的誤筆，當無疑義，蓋以曉、明兩母出字對譯梵語半元音音節 **vo**，實乃未之前聞也。至於以微母出字而對譯梵語半元音 **v**，則為不空三藏譯場裡另一個譯音系統上的特徵。<sup>53</sup>再者，關於「娑、薩」之異，則但在後者收入聲韻尾 **-t**，而皆為心母，後漢三國以降以心母對譯梵語清擦音 **s**，業已成為通例。<sup>54</sup>雖然如此，若從梵文語段 **sattvo** 來看，<sup>55</sup>則石經本的對譯，似乎顯得略高一籌，蓋以收入聲韻尾 **-t** 的「薩」而對譯 **sat**，「怛舞二合」則正用以對譯 **tvo** 是也。

**【筆者追記】** 審查者之一指出：以曉、明兩母出字對譯梵語 **v**，可否考慮「海」，該詞上古亦屬唇音(海從每聲，見董同龢上古擬音)，而此類音讀部份保留於中古方言中。**【筆者謹按】** 審查者的這項建議是值得重視的，雖然在西元八世紀至十世紀的河西方言裡，我們目前還沒有能夠找到此類音讀之例。

至於「怛侮」之譯，CBETA 錄文之中但凡二見，其一即為石室抄本的此處錄文，另一例則出自宋代法賢的譯籍。然其夾注體例較之石經甲乙二本則更趨於嚴謹，而注之為「二合引」。<sup>56</sup>至於石經本以「冒地薩怛舞二合」對譯

<sup>52</sup> 這極可能反映了其原初所依的梵文語形為 **bodhisattvah**。

<sup>53</sup> 參見劉廣和(1994)，頁 45。

<sup>54</sup> 參見俞敏(1984)，頁 281。

<sup>55</sup> 此一梵文語形在諸多梵語佛典抄本裡，往往也作 **satvo**。

<sup>56</sup> 譯例則可見之於《大正藏》，T8，頁 813b。

bodhisattvo，則於 CBETA 錄文中但凡三見，而其中便有一例是出自不空三藏之手。這三個譯例皆來自所謂「金翅鳥王真言」，而其間除雙排小字夾注或有繁簡外，真言部分則完全一致。其中在不空本人所譯出的《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經金翅鳥王品》裡，此一密咒的音寫形式作：「**冒引地薩怛舞**二合枳孃二合跛野底娑囉二合引賀引」(\*bodhisattvo j**b**apyati svaha；其餘二例見 T18，頁 122b、139b~139c)。此外，諸如以「冒引地薩怛囉二合」對譯 bodhisattv**h**，在 CBETA 錄文署為不空所譯的密咒裡，則極為頻出。<sup>57</sup>至於以「薩怛舞」對譯 sattvo，在不空三藏的傳世譯籍裡則有兩例，其音寫與夾注形式皆為「薩怛舞二合引」。<sup>58</sup>因此，若從音寫選字的風格來看，石經甲本出自不空之手的可能性應該是高於石室本的，而石室抄本的寫成年代或有可能是入宋之後吧！

事實上，在不空與慈賢傳世的密咒譯籍裡，也可以找到若干關於 **aryavalokitevaro bodhisattvah** 的漢音轉寫形式。不空三藏的譯例大致有五：

- (1) **曩莫阿哩也**二合囉**路枳帝濕囉**二合囉也**冒地薩怛囉**引二合也(\*namo aryavalokitevaraya bodhisattvaya；T20，頁 143a)；
- (2) **娜莫阿哩也**二合囉**魯枳帝濕囉**二合囉耶**冒地薩怛囉**二合耶(其原語同於(1)；T20，頁 457a)；
- (3) **娜麼引哩也**二合囉**路引枳帝引濕囉**二合囉(我今禮彼聖觀自在，\*namaryavalokitevarah；T20，頁 489b)；
- (4) **曩謨婆誡囉帝**歸命也**阿哩也**二合囉**路枳帝引濕囉**二合囉也聖觀自在菩薩**冒地薩怛囉**二合也(\*namo bhagavate aryavalokitevaraya bodhisattvaya；T20，頁 490a)；
- (5) **阿哩也**二合囉**路枳帝濕囉**二合囉(觀自在，\*aryavalokitevarah；T20，頁 489b)。

至於慈賢譯師，則但有一例：

- (6) **曩謨阿哩也**二合囉**路枳帝**(大正藏錄文作「希」)**濕囉**二合囉**野冒**(大正藏

<sup>57</sup> 其間《大正藏》錄文皆將「冒」書為「冒」(按：「冒」，為「冒」之俗體。《正字通·冂部》云：「冒，俗冒字」。譯例參見《大正藏》，T20，頁 489b。

<sup>58</sup> 譯例見《大正藏》，T20，頁 82c、536c。

錄文作「昌」)地薩怛囉二合野(其原語同於(1); T20, 頁 223b)。

其次, 在趙宋時期施護所譯密咒裡也有數例, 此處或可舉其中的兩例:

(7) 曩麼阿哩也二合囉路引吉帝引濕囉二合囉引野冒地薩怛囉二合引野(其原語同於(1); T20, 頁 504c);

(8) 阿哩也二合引囉路引吉帝引濕囉二合囉(其原語同於(5); T21, 頁 920a)。

從以上不空譯籍裡的這些傳世譯例來看, 顯然例(3)是其中音讀夾注最為詳盡而嚴密的。

### 3.gambhiram(1) prajba-paramita-(2)

(1) B本: gambhirayam (2) AB二本: -paramitayam.

儼鼻[引]囉[引](注一)深鉢囉二合般誡攘[二合引](注二)若播[引]波囉羅弭蜜哆[引](注三)多三

注一 石室諸本皆作「儼鼻囉」, 丁本作「儼鼻囉·」, 東寺本作「儼鼻覽、二合」, 石經本作「儼鼻[口+藍]」。

按: 東寺本此處「二合」的音讀提示顯然並不正確。又、若依嚴格的音讀提示, 或應於「鼻、囉」下各夾注「引」。此正如趙宋時期法天譯師音寫此一梵語之際, 便出之以「儼鼻引囉引」(T20, 頁 501a)。至於西元六世紀初抵華的菩提流志, 在他所譯出的密咒裡雖然也出現了「儼鼻囉」的譯例, 但卻全無此類夾注的存在。<sup>59</sup>此外, 在不空三藏的傳世譯籍裡, 則既未見「儼鼻囉」的譯例, 也沒有能夠找到「儼鼻囉」的音寫形式。再者, 以並母的「鼻」字對譯梵語送氣濁塞輔音, 則於諸本之間都無出入。此外, 石室本與石經本皆以疑母而收鼻聲韻尾-m的「儼」來對譯 gam, 而表現出了不空譯經集團不同於奘、淨二公以群母出字對譯梵語濁塞輔音 g 的音寫特徵。<sup>60</sup>

又、依石經本的「儼鼻[口+藍]」, E本還原為 gambhiram, 而 F本則還原作 gambhiram。此中, 若從梵語音節的劃分來看, 前者當為 ga-mbhi-ram, 而後者則作 gam-bhi-ram。因此, 不論是石室本或石經本, 兩者所據的底本當為

<sup>59</sup> 其譯例或可參見《大正藏》, T20, 頁 791c。

<sup>60</sup> 參見劉廣和(1994), 頁 42; 施向東(1983), 頁 28, 表 1-2。

**gam-bhi-ram**。

又、關於石經本的「[口+藍]」，《龍龕手鑑》作「魯貪反」，《正字通·口部》：「[口+藍]，貪[口+藍]，本作婪」；因此，該字音讀或為來母，而若與「婪」同音通假，則亦當收鼻聲韻尾-m而讀平聲。從這一點來看，在轉寫梵語音節ram的意義上，若依「咒文中字，口傍作者，皆轉舌讀之」的原則，則「嚶、[口+藍]」兩語的口傍都但在標記其為梵語顛音的音讀。至於其間的差異，可得而言者也但在聲調的平上而已。又、石經乙本於「[口+藍]」下夾有語段編碼<sup>六</sup>。

**注二** 石室夾注三本皆作「鉢囉誡攘二合」，丁本作「鉢囉攘·」，戊本作「鉢囉攘」，丁戊二本則一如前例，都略去「誡」字。東寺本作「鉢囉二合枳-壤二合·」，石經甲本作「鉢囉二合枳壤二合」，石經乙本作「鉢囉二合倪也二合」。又、石室諸本或當於「誡攘」下夾注「二合」音注。

**注三** 甲丙二本作「播囉弭哆」，乙戊二本則作「播囉弭多」，丁本作「播囉 弭蜜哆·」，其字「蜜」當為衍文。又、東寺本仍如其前而作「波羅二合弭跢·」，石經甲本同其前例而作「播囉弭跢上」，石經乙本此處則未再作「蜜多」而改書「弭跢<sup>七</sup>」。至於「哆、跢、多」之異，前已論之詳矣，此處不贅。

#### 4.-caryam(1) caramano vya-

(1) A本：caryam.

左哩焰<sup>(注一)</sup>二合<sup>(注二)</sup>行左囉<sup>(注三)</sup>行<sup>(注四)</sup>麼[口+女]<sup>(注五)</sup>尾也<sup>(注六)</sup>  
二合時<sup>四</sup>

**注一** 石室夾注本皆作「左哩焰」，丁本作「左焰·」，戊本作「左念哩焰反」，東寺作「者哩焰二合」，石經本皆作「左哩演二合」。在對譯梵語舌面塞擦音音節ca上，石室本與石經本皆出之以精母的「左」來對譯，而東寺本則採章母的「者」來轉寫該一音節。雖然如此，根據施向東1983(頁28，表1—2)，以及劉廣和1984(頁6)、1994(頁43)，玄奘、義淨與不空等譯家都以精、章兩母混用的方式來對譯梵語舌面塞擦輔音c。

至於「焰」，《廣韻》作「以膽切」，以母豔韻去聲，收鼻聲韻尾-m；而「念」，《廣韻》作「奴店切」，泥母[木+忝]韻去聲，也收鼻聲韻尾-m。至於「演」，《廣韻》作「以淺切」，以母獮韻上聲，而收鼻聲韻尾-n。若單就梵語輔音串而收鼻化元音韻尾的音節ryam來看，顯然石室夾注本較之石經本更

能符順原語的音韻狀況。並且，在梵語裡，所謂「音韻狀況」，其實就是指「語法標記」。洪堡特(W.von Humboldt)便曾經說：「梵語力圖使語法形式的種種細微差別在語音中得到體現」。<sup>61</sup>

因此，石經本「左哩演」的音寫應該要反映出原語陰性·單數·業格(Accusative)的語形 **-caryam**，而和語段[三]以「儼鼻[口+藍]」來音寫 **gambhiram** 一樣，如是方有可能取得格·數·性上的一致。然而，由於「演」的鼻聲韻尾 **-n**，而使「左哩演」的漢字音寫至多可以反映出來的最佳語形，只能是陽性·複數·業格的語形 **-caryan**。是否在相同的文脈裡曾經有諸如 **-caryan** 語形的梵語《心經》抄本流傳呢？至少在 Conze 1968(頁 150)裡是沒有的。並且，即便是有這種語形的抄本存在，那也只能算是不符語法的訛誤而已。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考慮在漢地音韻的流變裡或是在某些境內的方音中，是否曾經出現諸如 **am>an** 的情況了。E 本與 F 本逕自以收鼻聲韻尾 **-n** 的「演」而還原出 **-yam** 的語形，顯然是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吧。

其次，關於丁戊二本的省音與夾注。此中，丁本略去了二合前聲，亦即對譯梵語顛音 **r** 的「哩」，這種省音的情況在丁本中其實相當普遍，語段[二]即是一例；而戊本則仍一如前例，用泥母出字並添加特殊切語以變讀其音的方式來對譯 **r**，而沒有直接採取來母的「哩」。從戊本「哩焰反」的切語來看，夾注作者或抄手本人一方面把正文裡的「哩焰」改讀為「念」，同時卻又在夾注的音讀提示中把它給還原回來。若是參照語段[二]注一，則戊本的這種情況唯一合理的解釋，便是在夾注作者或抄手本人的方言系統裡，**n** 與 **l** 的音讀彼此接近，乃至兩者之間在音位上具有互換性。然而，根據邵榮芬 1963 與高田時雄 1988 的研究，這種方言似乎並不像是西元九·十世紀時期的河西方言。

注二 除石室乙丙二本外，其餘諸本皆有二合夾注。

注三 石室本與石經本皆作「左囉」，丁本作「左囉·」，東寺本作「者囉、二合」。按：東寺本此處的音讀夾注並不正確，或應刪去。

注四 乙本於「左囉」語段下則無此一語段意譯「行」的夾注。

注五 石室諸本皆作「麼[口+女]」，丁本作「麼[口+女]·」，東寺本作「磨[口+女]」，石經甲本作「麼喃」，石經乙本作「麼耨」。按：「麼、磨」二者，皆屬明母歌韻一等字，在對譯梵語鼻聲音節 **ma**，基本上並無任何差別。

<sup>61</sup> 參見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初版，第一刷)，頁 314。

至於石室本與東寺本用以對譯梵語舌尖後鼻聲音節 **no** 的「**[口+女]**」字，《漢語大字典》失收。此一漢字音寫詞若依 CBETA 所錄，其例則不足十見，並且皆出自密咒譯籍。其中，或可認定為唐代譯出者，凡有三例，而其餘諸例則都來自於北宋時期譯出的陀羅尼之中。在唐代譯籍裡的三例，有兩例則都出自同一部由師子國三藏阿目佉，亦即不空所譯的佛典，而另一例則來自曾與善無畏共事的一行作品。其中在一行所撰《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中，則直接以「**[口+女]**」來對譯悉曇字音 **nu** (T19, 頁 22a)。

至於傳為不空所譯《佛說不空罽索陀羅尼儀軌經》的兩例，其一是和《心經》所出密咒一樣，似乎像是略帶了一點韻體形式的密咒：「...舉**[口+女]**舉**[口+女]**者囉者囉旨哩旨哩主嚕主嚕...」(T20, 頁 435b)，其二為：「尾瑟**[口+女]**(\*visnu)那羅延」(T20, 頁 435a)。

至於北宋時期的譯例，其可得見者或有以下五例：其一為法天所譯出的《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囉嚕**[口+女]**(拏矩反,\*varuno)」(T21, 頁 908c)；其二為天息災所譯出的《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訖叉**[口+女]**(三合引,\*krsnu)」(T20, 頁 70a)；其三為施護所譯出的《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尾瑟**[口+女]**(二合,\*visnu)」(T19, 頁 583a)；其四為法天所譯出的《金剛針論》：「底帝哩**[口+女]**尼所引迦(\*tittirinoka)」(T32, 頁 169c)；其五為日稱等人所譯出的《福蓋正行所集經》：「鉢囉**[口+女]**摩那天(\*pranamana)」(T32, 頁 721b)。

從以上這些僅有的譯例來看，「**[口+女]**」這個新造漢字顯然和善無畏或一行等人有些關係，而不空三藏則是該一新造字詞的支持者。至於趙宋時期的諸譯家，則顯然是該一新造漢字的愛用者，此其一也。再者，唐宋之間在使用該一新造字詞上，也顯示了相當的差異，有唐一代的三例均未在該一新字之下添加任何夾注，不論其為切語或是二合之類的音讀提示；宋代則不然，除第五例之外，則都有夾注。此外，根據「拏矩反」的切語，則「**[口+女]**」為娘母夔韻，而依從「尼所」的切語，則此字的音讀為泥母語韻；由此可見，在法天心目中，這個新造字的聲母音讀似乎可以有娘、泥兩讀。因此，從石室《心經》音寫抄本與前揭的八個用例來看，「**[口+女]**」既可用以對譯梵語舌尖後鼻音音節 **no**，也可以拿來轉寫相同鼻音構成的 **nu**，而它用以對譯舌尖前鼻音音節 **nu**，則在唐代一行的著作中也早有譯例。

此外，石經二本在此一脈絡裡則分別以「喃」與「耨」來轉寫其對應的梵語音節。從漢語音韻分析的角度來看，石經甲本的「喃」，《廣韻》作「女

咸切」，泥母咸韻，平聲收鼻聲韻尾-m。<sup>62</sup>至於石經乙本的「耨」，《廣韻》作「奴豆切」，泥母候韻，乃去聲開音節字。然而，除非此處梵語音節中的輔音不是舌尖后鼻音 **n**，否則不論其音節為 **no** 或 **nah**，石經二本以泥母出字而未使用娘母字來對譯它，若從有唐一代的音寫慣例來看，都顯得頗為怪特而值得給予相當注意。因為根據尉遲治平 1982(頁 22)：「梵漢對音中娘母一律對譯梵文的舌尖后鼻音 **n**...泥母字一律對舌尖前鼻音 **n**...長安方音中娘母有區別於泥母的獨立的音值」，以及施向東 1983(頁 30)的研究，也認為「知徹澄端透定這六個聲紐在唐初中原方音中已分化為兩組，只有泥、娘混用的次數較多。...玄奘的對音中...兩紐是分開的。密咒的對音中，**n** 對[的漢字]全部是娘紐字；**n** 對[的 20 個漢字裡]，泥紐字 17 見，娘紐字 3 見。可以說，界線還是清楚的」。

至於在義淨與不空的譯音系統裡，兩者在鼻音聲母的比對上，劉廣和 1994(頁 43~44)也指出：在梵語舌尖前鼻音聲紐 **n** 的對譯上，義淨與不空都以泥紐出字對譯，而前者雖也間或以娘紐尼字對譯 **n**，但那只能算是個例外。然而，在梵語舌尖后鼻音 **n** 的對譯上，義淨雖以娘母居多，但偶有混用泥母的例外情況，可是不空三藏則一律以娘母出字對譯。

雖然以上這些關於娘、泥兩母的漸次分流的現象，在西元八世紀乃至其前的長安方言裡，都可以說是信而有徵的。但是，情況若是轉至其後娘、泥兩母分而又合的中古音後期的趙宋時代，或許就必須另外再行討論了。因為根據王力對宋代音系的描寫，西元十世紀末之際，娘母已然併入了泥母之中。<sup>63</sup>因此，石經二本在此一脈絡裡分別以泥母的「喃」與「耨」來轉寫其對應的梵語音節 **no**，或許正反映了這些文本成立時期娘、泥兩母已然合流的實況。

以上這些來自音韻與文字上的特徵，對於當前考察石經甲本是否真出自不空三藏之手的研究工作來說，尤其具有意義。我們的意思是說，石經甲本即使其當年所據之底本真出於不空之手，但它目前在音韻與文字上的某些特徵，則多少說明了該一文本或許是經過了後代的整頓。當然，[口+女]這個但只出現在少數幾位譯家譯籍裡的新造字詞，而在施用該詞之際又未增益任何提示音讀的夾注，則這類譯家自當該屬於有唐一代譯場中的人物，這一點可以說是毫無疑問的。至於此一新造字詞出現於石室抄本，而其語脈之中又無

<sup>62</sup> 此處若依石室本語段十五或四十二等的出字體例，則「喃」可以還原為 **nam** 或 **nam**。

<sup>63</sup> 參見王氏前引書，頁 261。

任何夾注，這一事實似乎也可以對這幾件石室音寫抄本的母本在年代定位上給出一些相當有意思的思索吧！

又、E本逕自將石經甲本的「麼喃」還原為 **mano**，然而在漢音梵聲的對勘上，「喃」的中古音讀如何可能得到 **no** 的語形呢？同樣的，我們也認為 F本此處對石經乙本所做出來的還原，或許也只是出於還原者個人主觀的臆測，而並未依漢語音韻流變舉出相應的證據以實其說。

**注六** 甲乙丙三本並石經乙本作「尾也二合」，而石經甲本則作「弭也二合」，丁本作「也」而無「尾」字，戊本則作「野」而一如丁本缺錄「尾」字，東寺本連上文作「磨[口+女]尾也、」。又、石經乙本於「尾也二合」下另夾有語段編碼八。

按：「尾」，《廣韻》作「無匪切」，微母尾韻；「弭」，《廣韻》作「綿婢切」，明母紙韻。首先，根據劉廣和 1994(頁 45)，在梵語半元音 **v** 的對譯上，義淨兼用並奉二紐，而不空則是微奉兩行。當然，這個現象多少也說明了義淨時期的長安方音裡，即使唇音的分化已經開始，但重唇的並、明二紐似乎尚未分化出輕唇的奉、微二紐。然而，到了不空三藏展開其譯業的時代，幫系與非系的分化便已告塵埃落定。<sup>64</sup>此外，從施向東 1983(表 1-3)所列出的奘師音譯系統，也可以見出玄奘與義淨在梵語半元音 **v** 的對譯上，彼此實無二致。施向東 1983(頁 31)並且認為玄奘時期長安音奉紐的音值是 **v**，而微紐的音值肯定不是 **v**。由此可見，以微母出字對譯梵語半元音 **v**，當該可以稱為是不空三藏音譯系統裡的不共法門之一。

石經甲本以明母的「弭」對譯梵語半元音 **v**，是否就可因此而排除該一文本出自不空之手的可能性呢？這當然還有待其他方面音寫現象的全面比對，方可定奪。至於明母的「弭」何以能夠拿來對譯梵語半元音 **v** 的問題，或許就有必要在此做一些說明。

首先是在隋代譯師闍那崛多於長安譯出的《佛本行集經》裡，譯者便有以明母字兼對梵語輔音 **m**、**b** 的情況，而奘師譯籍裡也反映出了類似的譯例，<sup>65</sup>至於不空的音譯系統裡一方面有以明母兼對梵語輔音 **m**、**b** 的情況，但同時又和義淨等人在唇音分化尚未落定之際，而採並、奉兩母對譯梵語濁塞音 **b** 的情況截然有別的，不空卻只用明母來對譯梵語濁塞音 **b**，<sup>66</sup>而石室抄本語段

<sup>64</sup> 參見劉廣和(1994)，頁 46。

<sup>65</sup> 參見葛毅卿，《隋唐音研究》，頁 110~111。

<sup>66</sup> 參見劉廣和(1984)，頁 46。

二]的「冒地」(bodhi)、語段五十二]的「糝沒地」(sambodhi)與語段五十三]的「糝沒馱」(sambuddhah)，都是此類以明母出字對譯梵語輔音 mb 或 b 的例子。

因此，從周隋而至西元八世紀不空與慧琳時期的長安方音裡，明母的實際音值或有可能是<sup>m</sup>b/。<sup>67</sup>前述的這種語音現象，也就是鼻聲母帶有一個同部位的塞音，好比在語段一]裡的「紇哩那野」(hrdaya)，「那」的實際音值或有可能在當時的長安方言裡便是<sup>n</sup>d/。這種情況當然容易使原來的鼻音或塞音在語流音變的過程裡產生程度不一的鼻音化或是塞音化的彼此消長，此外在唇音分化過程裡唇齒塞擦音/mv/的殘餘，以及梵語輔音 b、v 之間在印度音韻流變裡的互換現象，<sup>68</sup>這些因素或許就是造成 mb<b<v 變化的原因，而它也極可能就是石經甲本拿明母的「弭」來對譯梵語半元音 v 的主要原因吧。

【筆者追記】 審查者之一指出拙文多次提及「梵語半元音 v」，而[v]在語音學上屬「唇齒濁擦音」，非「半元音」。但[v]後來有可能演化為半元音[w]，或元音[u]，中西語言皆然。按：這一點筆者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把梵語的 v 視為 semivowel，不僅印度古來的語法學者是如此認定，而將「y, r, l, v」視之為是 antahstha，而且此一稱呼似乎仍通行於現今所見及的一些梵語語音學的相關作品之中，參見 Whitney 前揭書(頁 18 以下)以及 T.Burrow's 《The Sanskrit Language》(London 1973, p.66)。

### 【引用書目】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 1996：《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初版，第一刷。

福井文雅 1983：〈般若心經觀在中國的變遷〉，《敦煌學》第六輯，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敦煌學會編印，民國 72 年，頁 17~30；該文再收於福井 1987，頁 11~23。

福井文雅 1987：《般若心經の歴史的研究》，春秋社，1987 年。

周法高編製索引·弘教本 1962：《玄應一切經音義》，中研院史語所，1962

<sup>67</sup> 參見儲泰松 (1998)，頁 49。

<sup>68</sup> 參見 W.D.Whitney's 《Sanskrit Grammar》, § 50a, p.47。

年，初版第一刷·1992年景印一版。

柯蔚南 1991(W.South Coblin):〈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1991.

柯蔚南 1994:〈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7,1994.

柯蔚南 1999:〈Periodization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History〉,《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7, No.1,1999, pp.104~119.

羅常培 1931:〈梵文顎音五母的藏漢對音研究〉,收於《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中華書局,1963年,初版,第一刷,頁54~64。

儲泰松 1998:〈梵漢對音與中古音研究〉,《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一期,頁45~52。

劉廣和 1984:〈唐代八世紀長安音聲紐〉,原載《語文研究》,1984年,第8期,今收於《漢語論集》,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年,初版,第一刷,頁1~11。

劉廣和 1991:〈唐代八世紀長安音的韻系與聲調〉,原載《河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今收於《漢語論集》,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年,初版,第一刷,頁12~28。

劉廣和 1994:〈《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初探〉,原載《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今收於《漢語論集》,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年,初版,第一刷,頁41~57。

高田時雄 1988:《敦煌資料によ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京創文社,1988年,初版。

尉遲治平 1982:〈周、隋長安方音初探〉,《語言研究》,1982年,第2期,頁18~33。

施向東 1983:〈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頁27~48。

李新魁 1997:〈宋代漢語聲母系統研究〉與〈宋代漢語韻母系統研究〉,收於氏著《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年,初版,第一刷·1999年,第二刷,頁113~155。

王力 1985:《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初版,第一刷·1997年,初版,第三刷。

俞敏 1984:〈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收於氏著《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

- 京光生館，1984年，初版，第一刷，頁269~319。
- 張清常 1963：〈唐五代西北方音一項參考材料〉，原載於《內蒙古大學學報》1963年，第二期，今收於氏著《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初版，第一刷，頁63~85。
- 葛毅卿 2003：葛毅卿著·李葆嘉理校《隋唐音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第一刷。
- 高本漢 1994：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縮印第一版·2003年，第二刷。
- 蒲立本 1962：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年，北京，初版，第一刷。
- 邵榮芬 1963：〈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原載《中國語文》1963年，第3期，今收於氏著《邵榮芬音韻學論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北京，初版，第一刷，頁280~343。
- 曹仕邦 1990：《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初版，第一刷。

### 【補記】

在許多奇妙因緣的輻輳之下，自己竟然不知不覺地步入了一個已往並不熟悉的學術領地，而開始著手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的對勘與校釋。這一類奠基性的刻板工作其實並非個人所擅，而且也一向不是自己樂於從事的學術志業。記得是去年十一月左右，應某學誌之邀審查了一件由英文撰寫而以「奘師《心經》音寫本」為探究主題的學術論文。在這一件篇幅將近六十頁的論文裡，作者藉由中村元等人的梵語校訂本而審視了《大正藏》所收錄的《心經》音寫本，並嘗試透過「漢、梵音韻對勘分析」的立場而著手評估此一音寫本的成就與缺失。

1994年4月左右，在玄奘河南偃師故里及當年大師譯經所在的西安兩地，共同舉辦了一次有關玄奘一生學思及其學術成就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在該次學術會議裡，與前揭論文若相彷彿的，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的葛維鈞教授也發表了一篇題名為〈論《心經》的奘譯〉的文章，不過該一論文則是以石室音寫抄本來對勘 Conze 校本與其他漢譯傳本而著手評述奘師逐譯該

一文本的成就與缺失。<sup>69</sup>由此可見，自從陳寅恪先生發表其〈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跋〉一文，而懷疑此一石室文本或乃出自不空三藏之手開始，該一抄本似乎並未被華夏學圈的學者們給完全遺忘，斷斷續續地都有人著手其間的研究。

雖然如此，但是就個人日前手頭上所審查的這篇論文來看，該文作者的寫作態度固然是極其認真的，然而不論是佛教學、敦煌學乃至漢語音韻學方面的相關知識，該文作者似乎又都顯得相當生疏。在費時幾近一個月的審查過程裡，個人利用了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漢文佛典研究室」所藏《敦煌寶藏》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一方面仔細地對讀了石室抄本與《大正藏》的錄文，同時並著手查核前揭論文裡的各項論點，結果赫然發現該文的作者深受舛誤百出的《大正藏》錄文所害，其文中諸多不甚正確的觀察與論述，實乃拜《大正藏》充滿訛誤的錄文之賜。在個人長達七千餘字的審查報告裡，則分別從佛教學、敦煌學與漢語音韻學三個方面扼要地評述了該篇以「奘師《心經》音寫本」為探究主題的論文。在審查報告的撰寫期間，個人基於該項工作之需也同時著手了五件石室抄本的若干對勘。然而，就在該一審查報告送出之後，自己竟意猶未盡地捨不得離開這些擺在案頭上的《心經》音寫抄本。

其實不論是敦煌學，或是漢語音韻學，這兩門學科對筆者個人來講，除了一些基本知識而外，它們並非自己特別喜愛或專擅的學術領域，自然也就更談不上曾經做過任何深入的鑽研了。由於近時在目前服務的單位開設了有關法雲《翻譯名義集》的研究課程，而該書各項條目裡充斥的大量音寫詞，頓時之間也成為了課堂上的研討主題，同時也激起了師生之間想要一探究竟的學術企圖。中外學者們在隋唐音韻乃至西元七、八世紀以降西北方言上的相關研究，正是在這樣一個課程的脈絡下，進入了個人的閱讀世界裡。從今年年初開始，筆者一方面著手五件石室《心經》音寫抄本的對勘與校釋工作，同時也努力地蒐羅敦煌學與佛教學兩大領域裡學者之間有關《心經》音寫本的研究。福井文雅與方廣錫兩位學者的精心研究，以及昔日曾有師生之緣的陳燕珠女士遠赴北京房山雲居寺所做有關《房山石經》的田野報告，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了個人近幾個月以來書桌上擺放的案頭書。

《心經》這一部傳誦千古而家喻戶曉的佛典，其梵文原典與各式譯本之多，在浩如涇海的三藏之中，堪稱獨步。近時由林光明先生在「去蕪存精」

<sup>69</sup> 文見《南亞研究》第3期(1994)，頁2~9。

的編輯原則下所完成的百納本《心經集成》，其間包括古今梵、藏、漢各式文本，乃至當代各種語文的譯本，其總數便高達一百八十四種之多，由此或可窺見該一佛教文本在流通上的悠久與深廣！

雖然個人目前的對勘與校釋工作仍是以漢字轉寫的《心經》音寫本為中心，但是除了敦煌石室抄本與房山石經本之外，那些傳世的各種《心經》音寫抄本其實也都是個人極感興趣的本子。其間特別是榛葉元水於昭和七年纂編刊行的《心經異本全集》，據悉該書之中曾收有十七種包括法隆寺貝葉寫經，以及東寺觀智院所藏而署為奘師所譯的音寫抄本的照像寫真。榛葉元水的這部著作當然更是個人極力想要到手的重要文獻，但是卻始終苦於遍尋不著。不意正擬放棄之際，經由昔日門生游芬芳小姐的引介而認識了《心經集成》一書的纂編者林光明先生，並承蒙先生抬愛，慷慨地連同福井文雅、白石真道與榛葉元水等人的著作都一併惠借給了素昧平生的筆者。

雖然在林先生這一批寶貴資料到手的時候，個人對石室抄本的對勘與校釋工作其實業已進入尾聲，但無論如何仍對林先生的熱腸古道感激不已，同時也打算在翻閱這些新到手的資料之餘，著手整頓前此的一些對勘與校釋。因此，遂將寒假期間業已大致整頓妥當的部分以〈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序說〉為題，先行交付《中華佛學學報》，而筆者此一拙文或將於該誌的第十七期上刊出。

至於此處的「校釋」部分，則是在有關《心經》音寫本的若干重要文獻不可思議地突然現身於案頭之際——特別是榛葉元水纂編的《心經異本全集》，<sup>70</sup>以及白石真道所撰〈《般若心經》梵略本の研究〉<sup>71</sup>——筆者根據了這些文獻與資料重新將前此的舊稿加以整編而成。希望不久的將來，個人能夠在這些新入手的文獻與資料的協助之下完成有關石室抄本的整個對勘與校釋工作。

此外，從本年一月寒假伊始之初，在個人如火如荼地著手石室抄本的對勘與校釋期間，除了麻煩福嚴佛學院厚觀法師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陳佳彌小姐與方怡蓉同學，各自在他們專業的館藏中代為找尋佛教學的相關資料外，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兩位博士候選人孫致文與黃國清同學，也在他們埋首學位論文之餘四處奔走代為借閱書刊，同時碩士班的粘凱蒂與張嘉慧同學也幫忙檢索了不少有關隋唐音韻與西北方言的研究資料。一日所需，百工為

<sup>70</sup> 收於《般若心經大成》（開明書院，昭和五十二年，復刊版），頁 287～381。

<sup>71</sup> 收於《白石真道佛教學論文集》（京美出版社，1988），頁 462～498。

備，他們的辛勞，筆者謹在此一併聲謝。